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政治研究碩士班

碩士論文

國際現實主義下的小國策略選擇

—以瑞士與我國巧實力為例

Small Countries' Strategic Choices under International Realism-Taking Switzerland and R.O.C Smart Power as an Example

研究生：買郁軒　撰

指導教授：曾春滿　副教授

中華民國一〇七年六月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國際現實主義下的小國策略選擇

－以瑞士與我國巧實力為例

Small Countries' Strategic Choices under International Realism- Taking Switzerland and R.O.C smart power as an example

本論文係買郁軒君（學號 1070720110）在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7 年 5 月 14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委員兼召集人	董	筱	鄭
委員	楊	岱	孟
指導教授	曾	耆	滿
學系主任	莫	大	華

中華民國 107年 5 月 14日

國防大學政治系碩士生論文文責自負聲明書

本人瞭解並保證所撰寫之論文完全遵守著作權法及學術倫理規範，指導教授已善盡告知、審查、監督之義務。論文倘有抄襲、捏造、改作、妨礙他人著作權，或其他一切有違著作權及學術倫理規範之情事，以及衍生相關民、刑事責任者，概由本人負責，與指導教授、論文口試委員及政治學系所有師長無關。

論文題目：國際現實主義下的小國策略選擇－以瑞士與我國巧實力為例

研究生：賈郁軒(簽章)

學號：1070720110

指導教授：章秀潤

我已閱讀下方說明，並同時繳交原創性檢測報告。：

☑論文原創性檢測報告

☑學位論文口試作業規定第肆(六)條

經遭檢舉論文抄襲，且調查屬實者，雖已授予學位，專案報請國防部予以撤銷，並註銷其已發給之結業證書與學位證書。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5 月 29 日

謝辭

時間過得非常快，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已經要從研究所畢業，自己有太多應該要尊敬的、感謝的人事物，此時也是準備要倒數回部隊的時刻，也非常珍惜在這裡所發生的每一件事，讓我有更進一步的成長。

首先，要感謝我的指導老師－曾春滿老師，在研究這條路上，老師給我很大的空間與時間，透過不停地討論、修正，讓我的論文能夠順利完成，撰寫論文過程中因為害怕面對解決問題，也讓老師擔心不已，這是學生需要學習改進的地方，同時也非常感謝老師不辭辛勞的教導與指教。

再者，我要感謝一位特別的人－瑰娜，雖然與她未曾見過面，但卻給了我莫大的幫助，因為網路的發達，能順利地連絡上，而且對於我論文撰寫方向有很大的幫助。瑞士對我而言，是個陌生的國家，許多資料也都沒有她所提供的仔細，雖然本人無法到瑞士當地去瞭解論文所需的相關資料，但透過與瑰娜的與談中，能夠了解瑞士真正的面貌，沒有她的幫助，資料可能都只是書上文字敘述，而不是透過她的親身體會所得出有溫度的資料。

我要非常感謝家人與女友的陪伴與支持，讓我能無後顧之憂的撰寫論文，「研究之路是寂寞的」，但我並不這麼認為，因為在這條路上有許多人的幫忙，讓我能順利的完成論文。最後，陪伴我學習的國發組學長們，儘管我的年班最小，卻也是受到最多照顧的，這一段時光的陪伴、歡笑是我一輩子忘不了的。

我愛國發組！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人。謝謝你們。

買郁軒 謹誌於

北投復興崗

民國 107 年 6 月

摘要

在國際現實主義下，國家與國家之間為相互競爭且合作的，各國皆以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為最高目標，同時國際間是無政府狀態，每個國家行為體都必須主動爭取國家安全，無法單倚靠其他國家來生存。國際社會就如同人類生活的縮影，然人的本性是政治性動物，所以追求權力必然的，因此國家透過追求權力來獲取國家利益。本研究著重於小國在國際上與大國之間的互動關係，小國在面臨強權威脅下能有向外擴張、抗衡、避險、扈從等策略選擇。而其中的「避險」策略就是利用巧實力來突破困境，以軟實力來吸引盟友加入、尋求國際認同，再以硬實力為基礎，與外來威脅進行抗衡。

瑞士在資源匱乏、強國鄰立的情況下，選擇了中立國來避免戰爭的襲擾，再者，多元且理性的公民懂的如何共同維護好不容易得來的和平國度，不僅如此，在產業上也積極與國家形象進行連結，不斷創新與高品質保證成為瑞士的代名詞，這就是瑞士巧實力的展現。反觀我國，同樣在資源匱乏的情況下，利用出口產業創造出經濟奇蹟，但中國大陸的崛起，加上國際現實的壓迫，迫使我國在國際上的空間發展有限，因此我國必須利用巧實力策略來突破這樣的困境，來改變國家發展窘境，以達國家永續發展之目標。

關鍵詞：巧實力、小國策略選擇、國際現實主義、瑞士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Under international realism, countries and countries are competing and cooperating with each other. All countries are pursuing their own national interests as their highest goal.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anarchy. Each country's actors must take the initiative to fight for national security. Rely on other countries to surviv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like a microcosm of human life. However, human nature is a political animal. Therefore, the pursuit of power is inevitable. Therefore, the state seeks for national interests through the pursuit of power.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mall coun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nd the big powers. Small countries can face expansion, counter-balance, risk aversion, and obedience under the threat of power. One of the "hedging strategies" is to use smart power to break through the predicament, use soft power to attract allies to join, seek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then use hard power as a basis to compete with external threats.

Switzerland has chosen neutral countries to avoid the harassment of war in the absence of resources and strong neighbors. Moreover, diverse and rational citizens know how to jointly safeguard peaceful countries that are not easy to obtain. Not only that, but also in the industry. Linked with the country's image,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high quality assurance become synonymous with Switzerland, which is the Swiss smart performance. On the other hand, our country has also used the export industry to create economic miracles in the absence of resources. However,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the oppr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eality have forced China to have limited sp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Therefore, China must use smart strategies to Break through such a dilemma to change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dilemma,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Keywords: smart power, small country strategy choice, international realism, Switzerland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目錄

目錄 V

表目錄 VI

圖目錄 V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途徑、方法與研究架構 6

第三節　研究設計、研究範圍與限制 9

第二章　文獻分析與理論探討 11

第一節　國際現實主義之定義與內涵 11

第二節　權力不對稱之國際互動結構 14

第三節　巧實力的內涵及運用 19

第三章　瑞士與我國之巧實力比較分析 26

第一節　瑞士特殊國際地位與巧實力案例分析 26

第二節　我國特殊國際地位與巧實力案例分析 33

第三節　兩國巧實力之整體發展與比較分析 46

第四章　賽局理論下之小國策略選擇 49

第一節　大棋盤現勢下之瑞士競合策略選擇 49

第二節　兩岸不對稱形勢下之我國安全困境策略選擇 63

第三節　我國走向東方瑞士之路的挑戰與可能性 72

第五章　結論 80

第一節　研究發現 80

第二節　研究建議 82

參考文獻 84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表目錄

表 3 - 1 瑞士 SWOT 分析 46
表 3 - 2 我國 SWOT 分析 47
表 4 - 1 近兩年主要國家全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指數（GEI）分數與排名 53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圖目錄

圖 1 - 1 研究架構圖 8
圖 1 - 2 研究設計流程圖 9
圖 2 - 1 廣義的 2x2 賽局理論 16
圖 2 - 2 小國面臨威脅可能採取之策略 18
圖 2 - 3 權力的內涵 21
圖 2 - 4 巧實力概念圖 22
圖 3 - 1 瑞士產業巧實力展現圖 32
圖 3 - 2 我國產業巧實力展現圖 45
圖 4 - 1 瑞士語區圖 57
圖 4 - 2 台灣近 18 年斷交國示意圖 73
圖 4 - 3 台灣民眾統獨立場趨勢分佈 74
圖 4 - 4 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圖 76
圖 4 - 5 中國大陸人民來台人數 77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動機

二十一世紀，「巧實力」（Smart Power）一詞成為各國爭先恐後追求的治國理政目標，而巧實力概念最早由學者蘇珊娜・諾賽爾（Suzanne Nossel）於 2004 年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雙月刊所提出，主張美國應結合硬實力（hard power）與軟實力（soft power）來實現外交目標，[1]之後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前院長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將巧實力定義為「結合硬實力和軟實力的致勝策略能力」，[2]換言之，巧實力就是巧妙的結合軍事與外交手段的策略能力；在 2009 年，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R. Clinton）在外交關係委員會上表示美國將採取「巧實力戰略」來處理國際關係，軟硬兼施（Carrot and stick）策略，不僅僅要團結盟友，也要接觸對手，也就是說，處理當今的國家問題，不僅只是靠傳統的武裝力量，更強調外交手段的能力，從此可見，巧實力已經成為具體明確的政策途徑。

拿破崙曾言：上帝站在兵力優勢的軍隊一邊，顯示軍事力的重要性，然在冷戰（Cold War）時期，國際政治舞台上美俄兩強形成兩極對抗的發展局勢。透過不斷的軍備競賽（Arms race）來展現其大國的「硬實力」。世界各國為了證明自我國家的軍事防備能力，也紛紛增加經費預算，積極投入建軍強國的目標。然而冷戰結束以後，蘇聯政權垮台，美國成為世界的超級強國，形成一超多強的國際體系，儘管如此，仍有許多區域性的強權，試圖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面對未來的挑戰與危機，美國則選擇以「巧實力」概念與盟友及敵人進行交往，說明國家

[1] Suzanne Nossel, “Smart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83, No. 2, 2004, pp. 131-142.
[2] 約瑟夫・奈伊著，李靜宜譯，《權力大未來-軍事力、經濟力、網路力、巧實力的全球主導》（臺北市：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頁 47。

若要永續發展光靠硬實力是不夠的，而是要透過多面向的發展，運用了巧實力來面對國家的挑戰，促進國家的利益。

在 2008 年，約瑟夫・奈伊，再次強化論述「巧實力」的概念，以不同的觀點來解釋冷戰後的全球權力轉換型態，他認為冷戰後兩極體系崩塌，全球的權力分佈形成錯綜複雜的三度空間、一是國家的軍事力量、二是國家的總體經濟能力、三則是權力已經從政府手中轉向非國家行為者，例如：恐怖分子的恐怖攻擊、駭客危害網路安全、以及病毒疫情與氣候變遷等威脅，這類的問題已經無法單用軍事力量來解決，[3]而是要透過經濟、軍事等硬實力與政治、文化等軟實力來共同解決一國所要面臨的世界局勢。

在現今全球權力競逐的賽局中，國家行為體必須一心多用，同時進行軍事、經濟、政治、文化、巧實力等大棋局[4]，而對手可能是單一國家、多國聯盟，甚至是「非國家行為體」，在這樣時空環境下，光是擁有傳統的硬實力，或甚至加上轉型後的軟實力是不夠的，而是必須擁有隨時創新的「巧實力」。

在國際現實主義的理論與實務中，國際間是長期處於無政府狀態（anarchy）下，「生存」成為一個國家的核心目標，「無政府」一詞並非代表混亂、虛無或道德淪喪的狀態，而是國家間自由的相互合作或競爭，以取得最高的國家利益為目標，而在追求國家利益的過程中，要同時維持權力平衡的狀態，不至於造成國家之間的惡性報復，例如戰爭、恐怖攻擊……等等；然而在國家間的關係為弱肉強食的狀態下，強國有相對的手段可以直接影響小國，因此，在這混亂的局勢下、

[3] 約瑟夫・奈伊著，林添貴譯，《美國世紀的終結？》（臺北市：麥田出版，2015 年 12 月），頁 146-147。

[4] 布里辛斯基著，林添貴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8 月），頁 12。

大國主宰的國際舞台，小國為了達成最大利益而與大國相互合作或競爭[5]，必須做出最佳的策略選擇與巧實力應用，掙出屬於自己的生存之道。

在現今國際政治舞台上，中國大陸的崛起不僅僅牽動世界的局勢，對於我國而言更是重大的威脅，臺灣（Taiwan）位處於太平洋與歐亞大陸之間，亦是亞太地區重要的軸心位置，重要的戰略地理位置成為世界兩強美國與中國大陸所必爭之地；因此，在大國之間的小國策略選擇與巧實力靈活運用就更為重要，而我國究竟是要向美、親中、還是能採取巧實力策略，從兩國之中獲取最大國家利益的第三條路[6]？

同樣位處於重要的戰略地理位置以及四周環繞強國威脅的情勢下，瑞士（Switzerland）則選擇成為世界的永久中立國，一個位處於西歐中部內陸山地的多民族的國家，國內有著四種不同的官方語言，擁有這樣的多族群、多語言、多文化的背景而言，相類似於我國多元民族與複雜的文化背景，瑞士卻能在大國環伺的地理政治中展現出高度的民主、成熟的公民素養、穩定的經濟能力；同時，還能維持國際上的中立地位並與其他國家共榮共存，同時也在國內取得高度國家認同感，這樣的巧實力綜合成果深值得我國學習及效法。

綜合上述，本研究動機如下：

（一）現今的國際政治下，巧實力如何成為國家永續發展成功的要素。

（二）小國策略選擇中，巧實力策略如何發揮其關鍵作用。

（三）瑞士的成功案例，如何成為我國學習的範例。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5]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p.89-91, pp.93-95 and p.98.

[6] Giddens 著，鄭武國譯，《第三條路：社會民主的更新》（臺北市：聯經出版，1999 年），頁 73。

貳、研究目的

在權力不對等（Power Asymmetry）的世界「大棋盤」戰略中，[7]大國總是扮演著主導者，而小國卻淪為棋盤上的被動者，因此在國際現實主義的賽局中小國靠巧實力來扭轉情勢，成為自身國際地位的主導者，以確保國家安全未來的走向，並發展出獨樹一格的國家治理模式以面對險峻的國際現實主義局勢，至為重要。

《道德經》六十一章：「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如果小國謙卑的對待大國，就會取得大國的認同或支持，這是老子在二百五十年前說的。以常理來說，小國在面對大國通常是屬於弱勢的一方，因為不論從軍事、人口、經濟規模的角度來看，小國要能取下大國實有難度。

例如，約五百年前，義大利北方有個小城邦翡冷翠與當時為政治、宗教、文化中心的城邦教庭羅馬交惡，於西元 1479 年，翡冷翠已被羅馬聯軍圍困整整一年多，面臨城破國亡的危機。當時的翡冷翠君主羅倫佐（Lorenzo de Medici）利用三個月依靠著談判使羅馬最重要的戰友－拿坡里，撤軍離開羅馬聯盟，進而造成骨牌效應，最後連羅馬也撤兵。

然而，面對羅馬的威脅，羅倫佐不僅依靠著圓滑外交手段來使羅馬撤兵，更重要的是對於詩歌、藝術、哲學的涵養。長達三個月的談判，不可能都是軍事上的議題與溝通，這就是利用巧實力來保家衛國的真實案例。而我國相對於其他大國，就如同翡冷翠相對於羅馬一樣，利用巧實力來面對大國的威脅，不僅能化險為夷，亦能展現出小國對於大國的重要性[8]。

因此在二十一世紀，國際戰略環境不斷改變，戰爭形態的轉變下[9]，從以往戰場上的兵戎相見，到現今沒有明確戰場或戰線的國際競合戰，我國所要面對的危

---

[7] 布里辛斯基著，林添貴譯，前揭書，頁 14-15。
[8] 林中斌著，〈翡冷翠的故事〉，《聯合電子報》，民國 102 年 8 月 16 日。參見 http://paper.udn.com/udnpaper/PID0030/242602/web/，瀏覽日期：民國 107 年 1 月 17 日。
[9] 約瑟夫・奈伊著，林添貴譯，前揭書，頁 45。

機卻是日益提升，從恐怖主義、非傳統安全議題到國家整體安全，面臨這樣的挑戰，國家亟須以新思維來規劃國家永續發展的策略選擇，結合國家硬實力與軟實力，展現出「以小博大、穩中求勝」的巧實力來開闢全新的國際視野。[10]

綜合上述，我國無論是種族語言組成、地理環境或是面臨周邊強鄰國家的情境，皆與瑞士有相似之處，惟瑞士當今的國際地位與國家策略選擇卻與我國有所不同。尤其，我國在地理位置或國際地位皆處於國際間灰色地帶的情況下，我國若能調整出屬於自己的巧實力與策略選擇，亦能達到永續發展之目標且與其他國家共榮共存願景。

本研究目的主要目的如下：

（一）在權力不對等的全球棋盤中，小國的策略選擇與巧實力應有作為。

（二）巧實力對於國家政策發展的意義與影響。

（三）當今的國際情勢中，我國成為「東方瑞士」的挑戰與可能性。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0] 約瑟夫・奈伊著，李靜宜譯，前揭書，頁 260。

第二節　研究途徑、方法與研究架構

壹、研究途徑

「所謂研究途徑，乃指研究者對於研究對象（譬如政治現象）的研究，到底是從哪一層次為出發點、著眼點、入手處，去進行觀察、歸納、分類與分析」。[11]本研究採現實主義理論（Realism）作為研究途徑，權力不對等下的國家互動係屬國際關係類別，而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所提出的現實主義理論最能解釋其國家之間的互動與權力關係。摩根索在《***Political among Nation***》中提到「各國之間的利益衝突與實力不均等使國家間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12]且權力鬥爭的過程中國家會採取三種行為：保持權力（保持現狀，反對干預或製造和平）、拓增權力（帝國主義為代表）、展現權力（以外交或軍事力量製造嚇阻或威望）[13]，因此從摩根索的現實主義觀點來解釋國家行為是最恰如其分。

以現實主義為研究途徑來觀察及解釋權力不對等下的國家互動，則須以當時的國際環境為基礎。冷戰結束後，兩極體系的崩解，多元化與區域性的國際型態比肩同勢，形成新型的國際型態。隨著國際情勢的改變，國際間雖已不再是兩強爭霸，但強權國家與弱勢國家依舊相去懸殊，然追求各自國家利益則是各國與生俱來的能力，同時間也要維持國際間的平衡。國家行為體在國家利益與國際秩序之間要取得平衡，其中又以小國為基礎，端看政府如何考量國際情勢、制訂政策，替國家帶來最大效益。透過國家硬實力與軟實力的結合，制定出國家自成一格的巧實力策略，來面對大國的威脅，亦或只是淪為大國權力擴張的犧牲品。

---

[11] 朱浤源，《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臺北市：正中書局，2002 年），頁 182。

[12] Hans J. Morgenthau，徐昕等譯，《國家間政治－尋求權力與和平的鬥爭》（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 年 12 月），頁 11。

[13]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Fifth Edition, Revis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8), pp. 4-15.

貳、研究方法

Delbert C. Miller曾在Handbook of Research Design and Social Measurement中指出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的差異，研究者必須先確定要採用的研究途徑，然後方能選擇所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所謂的研究方法就是指搜集資料的方法[14]。

本研究經確認研究途徑後，決定採用計量分析法與質化研究法，作為此次論文的資料搜集方式：

一、計量分析法

主要從總體來比較相似性及差異性，透過計量分析來比較適用對象、範圍和條件、應用案例、發展趨勢等方面的異同點，釐清各自特點、優勢與局限，為綜合方法的論證奠定基礎[15]。，從蒐集有關研究對象的國力數據（GDP、Green GDP、人口、國防支出等等），研究小國在權力不對等的國際局勢下的策略選擇，透過觀察分析可推測我國面臨強鄰的政策選擇之運用及變項。

二、質化分析法

質化分析法主要在探究行為，透過文件分析、研究問題、綜合資料後，藉由完整且詳盡的描述與分析後，了解過去的事件、個人、或運動，研究者透過詮釋事實，以了解及釐清意義，而這些意義可能對於現行的實務與問題構成影響。[16]本研究將透過相關文獻的搜集、閱覽、分類及系統性的消化，透過歸納、比較及印證，進而整合出小國在面臨強權國家所可能做出的策略選擇。

---

[14] 朱浤源，前揭書，頁184。

[15] James H. McMillan, Sally Schumacher著，王文科編譯，《質的教育研究法》（臺北市：師大書苑，2000年），頁9。

[16] 同上註，頁12。

參、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現實主義論點作為研究途徑，探討小國在面臨權力不對稱的國際局勢下的策略選擇。當今國際局勢中，光靠硬實力的展現是無法永續發展的，然在現實主義的論點當中，國家以追求權力為主，以達國家利益為優先考量，再者，大國對於小國有相當的影響力與牽制力，則小國該如何選擇適當的策略為考量以維持國家利益？透過結合硬實力與軟實力的策略決定，不僅讓小國能發揮最大巧實力的效能，亦能達到穩定和平與永續發展之目的。本研究之架構圖如圖1-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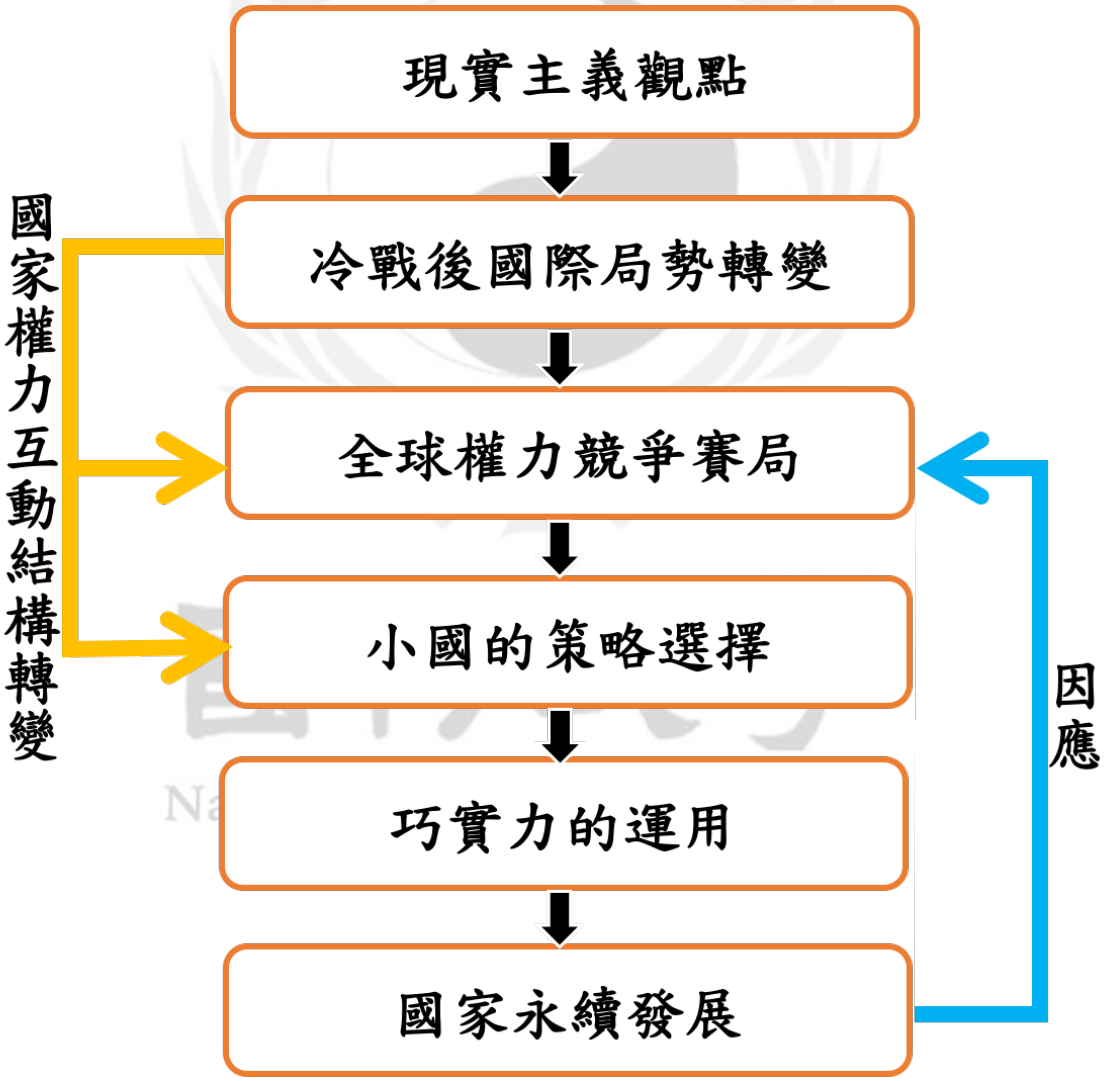

圖 1 - 1 研究架構圖

第三節　研究設計、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流程設計

本研究以現實主義理論作為研究途徑，以探討小國在不對稱的國際局勢當中會有怎樣的策略選擇，依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進一步產出本研究的目的。在釐清問題與面向後，蒐集問題相關背景以及權力不對等有關之文獻，探討小國在權力爭奪的大旗盤中，能有怎樣的策略抉擇。

將蒐集的資料歸納分析，輔以現實主義的觀點假設，推測我國在面臨權力不對稱的國際情勢下會有怎樣的策略選擇。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下圖所示：

圖 1 - 2 研究設計流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貳、研究範圍與限制

研究範圍是明確界定研究者在論文所要「處理」的人、事、時、地、物，同時必須有充分理由解釋只觀察這一部分。[17]本研究主軸以現實主義觀點探討權力不對等下的小國策略選擇，並聚焦於冷戰後國家權力的型態變動，小國在面對強國主導的國際局勢當中，如何創造出獨樹一格的巧實力模式，在泱泱大海的國際棋盤中別具一格並創造出不可取代性，來面對險峻的國際情勢。

研究對象選取為瑞士及我國，透過兩者的比較分析，來透析瑞士如何利用巧實力來因應國際局勢，且創造出不可取代的國際地位，從中獲取瑞士成功的經驗，反觀我國在中國大陸崛起與國際地位模糊的雙重威脅下，又該如何利用巧實力來面對，研究時間範圍則由冷戰結束後迄今。

本論文以研究瑞士與我國之間的巧實力運用為主題，在資料方面，鑑於瑞士當地資料以德文、法語、義大利語與羅曼什語呈現，然礙於筆者的外語能力，因此只能針對官方英文資料與文獻做研究，並加以國內相關著作與翻譯資料，配合網路資訊以及最新數據，作為本論文的參考資訊。再者，要深入了解當地政府的策略選擇與巧實力運用，礙於時間、人力與物力的限制下，無法到瑞士當地做深入訪談與調查，對於這些研究過程當中的諸多限制，本研究只能透過網路獲取官方資訊數據以及國際針對瑞士的相關研究來彌補，並以客觀、中立、謹慎的態度進行研究。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7] 羅清俊，〈如何讓博碩士論文更有說服力？〉，《「撰寫碩博士論文與投稿學術期刊」論壇》，2007 年。參見 http://www.ntpu.edu.tw/~pa/admission/960106-1.pdf，瀏覽日期：民國 106 年 9 月 17 日。

第二章　文獻分析與理論探討

文獻分析之目的在經由「文獻資料」進行研究，主要在幫助研究者從文獻中了解過去、重建過去、解釋現在，進而推測未來，同時協助研究的進行。[18]本研究將瞭解小國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採取的巧實力策略與策略選擇，以及在面臨強鄰國家的情況下，我國的策略選擇能否與瑞士一樣，讓我國成為「東方瑞士」，創造出專屬的國家特色。本章藉由國內外學者之相關研究成果，分析在權力不對稱下小國所能發揮的巧實力轉變之因素，列出主要變項做為後續研究比較之基礎。

第一節　國際現實主義之定義與內涵

就國際關係現實主義派的觀點，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是競爭關係，更是弱肉強食的食物鏈，各國為求自保國家利益，必須拓展國家的勢力來保護國家安全及利益，而我們可以依據不同面向來解釋歸納國際現實主義，第一是強調無政府狀態為核心，第二則是以人性為基準的現實主義途徑來分析國際關係。[19]

「結構現實主義者」（Structural Realists）十分強調無政府狀態，政治學家約翰・赫茲（John H. Herz）的看法，從人類社會的政治生活觀察，主要包含安全與權力因素。從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權力爭奪，以及政治單位內的個人與團體的權位（power position），決定了政治的本質。他認為現實主義，係指一種特殊型態的的政治思想。[20]隨著人類政治經驗的擴展，政治生活中所呈現的安全與權力困境，其焦點已由個人之間轉為國與國之間，而當今政治現實主義所矚目的，就是國際政治上的權力鬥爭。

---

[18] 葉至誠，《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新北市：商鼎文化出版社，2005 年 3 月），頁 136。
[19] Jack Donnelly 著，高德源譯，《現實主義與國際關係》（臺北市：弘智文化，2002 年），頁 10。
[20] 廖中和著，《國際政治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12 月），頁 111-112。

「生物現實主義者」（Biological Realists）則強調固定不變的人性，摩根索即認為社會乃是人性運作下的產物，人類群居的世界也是人性的投影，所謂的政治問題也是人性在社會上的轉變結果。[21]肯尼斯・沃爾茲（Kenneth Waltz）主張國際社會是個無政府狀態，「每一個個體的主要行為動機，就是要取得一個能保護自己的位置。因為在這個環境下，自己的生存安全，除了主動爭取，並沒有其他人可以依靠」[22]。同時，他也提出「權力平衡」（balance-of-power）理論來解釋國際政治間的國家互動關係。

在無政府的狀態下，沒有一個具有權威的國家，會幫助較小的國家，或者給予其資源協助；在權力平衡理論下的核心，國家會選擇平衡其他行為者，而非依附強國。因為依附強權只會淪為其手中的獵物，而非得到真正的穩定[23]。然而權力平衡係屬現實主義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主要維持國際體系運作穩定的機制。在過往的歷史當中，無論是歐洲的多邊協議，亦或是冷戰時的兩強對峙，皆能解釋現實主義中用以印證權力平衡的範例。儘管沃爾茲提出的權力平衡理論解釋了長期在國際政治間不斷演進的規律或方向，但還是無法全面性及有效性的解釋非理性國家行為。實際上，當前主導國際社會的強權政治（great power politics），仍然利用權力平衡來穩定國家利益與體系中的相對平等[24]。

現實主義的核心為權力。現實主義理論乃是基於對人性的了解，是有歷史性的，而非抽象的。亞里士多德曾言：「人是天生社會性的動物」，認為人的本性是政治性的動物，所以追求權力是必然的。無論在任何時空這樣的情況是普遍存在的，是一種社會的動態法則。

---

[21] Jack Donnelly 著，高德源譯，前揭書，頁 11。
[22] 同上註，頁 21。
[23] 同上註，頁 23。
[24] 譚偉恩，〈權力平衡理論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國際關係學報》，第 22 期，民國 95 年，頁 129-165。

綜合以上所述，現實主義是人類生活經驗所得出的產物，以人類對於生存的基本訴求，擴大到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來作為國家之間的行為依據，以無政府狀態為前提，並提出權力平衡的概念來作為國家的互動關係。在現實主義框架下，追求權力則是國家的根本行為，透過此行為來追求更高利益，達到國家生存與永續發展之目標。

國際情勢在冷戰後有重大的改變，國際社會的趨勢從美蘇兩極走向多元，國家之間軍事力量的擴張轉為經濟力的相互競爭與合作，國家彼此的互動彈性也擴大，從官方與官方之間，轉由非政府之間的相互交流，因此國際學者對於冷戰是否已經結束仍有辯論，相較於今日的美俄關係與「冷戰時期」已經今非昔比，更何況當今國際情勢已經不是美俄兩國來決定，也因此有一派學者稱當今的國際局勢為「後冷戰時期」，意指國家之間雖然沒有像以往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的大規模戰爭，但區域的小衝突與國家之間的資源歸屬衝突卻還是不斷上演，也代表著冷戰並未結束，而是以國家間的經濟競爭與區域衝突的方式來呈現[25]。

冷戰係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列強與以蘇聯為主的共產國家彼此長達半世紀的政治對抗，然在柏林圍牆倒塌後亦代表冷戰告一段落，國際秩序正在慢慢的改變，舊的體系正在崩壞，而新的體制逐漸形成。對於冷戰結束後的國際社會型態，有學者稱之為「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下的國際社會」……等等，來解釋新的國際秩序狀況。在經過以經濟發展為國家發展方針的世界主流後，美國依然是世界強國，然中國大陸卻在這一波經濟成長當中崛起，躍升成為能影響國際社會的大國，而當今國際情勢中的美國與中國大陸，彼此之間既競爭又合作，雖然雙方無論在經濟力的發展或軍事力量的擴張，沒有因為當

[25] 魏萼編，《後冷戰時期之國際新秩序－中華民國之角色》（臺北市：亞洲與世界社，1991 年 7 月），頁 14-15。

今的平和時期而削弱，國際社會中目前無論戰爭型態、主導角色皆與冷戰時期不同，因此冷戰後的國際情勢不能稱之為「後冷戰時期」，而是一個國家需要結合經濟與軍事加上政治與文化的新國際體系。

第二節　權力不對稱之國際互動結構

美國在冷戰後，成為稱霸全球的強權國家，傲視群雄，然而重挫她的卻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規模不及國家的激進宗教勢力及恐怖主義份子。相較於美國的正規軍力，攻擊者採奇襲且極端的手法來重創美國，造成國際恐慌。這樣實力懸殊的差距，卻能造成美國創巨痛深，因此，「不對稱」一詞開始廣為討論，尤其集中於軍事及戰略領域。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布蘭特利・沃馬克（Brantly Womack）在研究大小國不對稱關係中，著重於中越關係，他認為權力不對等在國際社會上是常態，對稱是異例、或是想像。中國大陸之於周邊國家、美國之於中國大陸、甚至是中國大陸之於我國皆是屬於不對稱狀態。而大小國之間的力量懸殊早已決定雙方關係的發展，大國所冀望的是小國的尊重，小國所感受的是大國的威脅與如何免於毀滅，雙方重視程度的不同則會造成衝突與誤解[26]。

我國政治學者吳玉山則是將俄羅斯與另外14個前蘇聯鄰近國家做比較，並將其經驗套用於兩岸關係，係為「大小政治實體模式」，大國策略是屈服小國意志，而小國則可能採取「抗衡」（balancing）或「扈從」（bandwagoning）策略，「抗衡」是指小國藉由本身實力（內部平衡，internal balancing），或是透過聯盟外力（外部平衡，external balancing）來對抗大國對於小國的壓力與威脅；「扈從」係指小國單方面限制自身行為以避免與大國利益衝突，進而保持現況或

[26] 包宗和、吳玉山著，《重新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社，2012 年 9 月），頁 38。

緩和關係。當然小國也有可能遊走在兩者之間，採取「避險」（hedging）的策略，從中爭取最大利益[27]。

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蘇軍瑋則拋開現實主義的框架，從歷史中企圖去還原當時決策者的心態，著眼於明鄭與清廷，採用張啟雄教授的「名份秩序論」[28]，認為中華文化中的特殊關係與西方現實主義截然不同，主要是歷史的形成，透過文化的傳承，深植決策者的內心，自然不能以西方的思維來套用。在蘇軍瑋的論述中，小國不是只有抗衡與扈從的選項，若小國過去曾是大國的統治者，自然有「推翻」（rollback）的選項。相較於前面兩者的論述，蘇軍瑋的看法則是「唯心主義」的。

綜合上述所言，權力不對等在國際間是一種常態現象，並非特殊狀況。小國對於大國的威脅，可能會採取「抗衡」、「扈從」、「避險」等行為來面對大國，而我國與中共有歷史文化的牽絆，對於這樣的特殊狀況，小國則可能採取「推翻」的行為。但事過境遷，國際現實情況與當前的實力狀況比較，我國若採取「避險」行為，且利用巧實力策略，則可以獲得較高的利益。

為了清楚地界分小國在大國威脅下可能會有的行為，國與國之間的互動也能從賽局理論中的相互關係來釋意，「因為受到運用數學、統計，或者是嚴謹邏輯思考方式作為研究途徑的影響，當前學術界對於社會科學的研究，越來越走向擁有高精確度及正規形式化的理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學領域發展出一套以數學推力（nudge）為基礎的賽局理論（game theory）」[29]，因此權力不對等也能用於賽局理論來解釋（如圖2-1），在賽局理論中，最簡單的結構只有兩位理性的行為者，彼此互動中雙方只有兩種決策選擇，一是合作、二是背叛。

[27] 包宗和、吳玉山著，前揭書，頁 40-41。
[28] 同上註，頁 44。
[29] Jack Donnelly 著，高德源譯，前揭書，頁 25。

		第二行為者	
		合作	背叛
第一行為者	合作	CC R,R 3,3	DC T,S 1,4
	背叛	CD S,T 4,1	DD P,P 2,2

R=reward 獎賞　　S=sucker 受騙
T=temptation 引誘　P=penalty 處罰

圖 2 - 1 廣義的 2x2 賽局理論

資料來源：Jack Donnelly著，高德源譯，《現實主義與國際關係》（臺北市：弘智文化，2002年），頁28。

當雙方兩者在選擇合作或是背叛策略時，彼此也都不清楚對方的選擇為何，假設雙方皆選擇合作的策略，以個體來說能獲得第二高的報酬率（圖2-1左上角方格，雙方合作的報酬是3,3）。即使雙方都知道能相互合作能獲取相對高的利益，但就個體而言，以理性來判斷，且在不知情對方的選擇策略時，若選擇背叛則可以獲得較高的報酬。儘管清楚知道選擇背叛的策略雙方所獲得的報酬會比較不理想，但為了解決這樣的困境，則可能雙方皆相互背叛。

假設雙方能簽訂合作條約，如此一來就能輕鬆解決這樣的困境，但這樣的合作關係並非永恆不變的。現實主義就猶如囚徒困境一樣，而國際關係中現實主義亦是其核心理論，在無政府的狀態下，以及現實主義中利己主義與無道德狀態下，小國的策略選擇就顯得格外重要。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在無政府的狀態下，國家必須採取採取特定的政策來延續自己的生存與發展，倘若國家擁有自由選擇的空間，他們可能將採取抗衡的方式來面對外來的威脅。所謂的自由選擇也能解釋成國家的綜合國力，綜合國力越強，選擇的空間就越大，反之亦然。

當國家在判斷外部威脅時，主要取決於生存層次上的設定。而每個國家所設定的目標可能不同，當然在不同時期，國家的預設目標也會因此而不同。我們主要可以將生存層次分為追求權力（拓展勢力）與追求安全（力求穩定）兩種狀況。通常將目標設定在追求權力的國家，主要在爭取一定程度的稱霸，對外擴張勢力主要是為了主導局勢或改變現狀，也因此這樣的國家稱之為「改變現狀國家」（revisionist power）；然而將目標設定於追求安全的國家，主要試圖維持自主權或保持現狀，追求過多的權力可能招致更多危險，而這樣的國家稱之為「維持現狀國家」（status quo power）[30]。

再者，聚焦於小國面臨威脅時所可能採取的策略。對於改變現狀的小國而言，向外擴張具有強制性的意味與手段，試圖將本國的影響力拓展到其他國家，甚至獲取他國之領土。不過由於小國在與其他國對比中容易居於弱勢，若有衝突發生，小國獲勝的機率通常不高。除非小國擁有強力的盟友，或擴張手段建立在合法的基礎上，否則小國要採取這樣的策略機率並不高。另一方面，對維持現狀的小國而言，主要是讓其他強鄰國家能承認小國的獨立自主權，至少大國必須承認小國存在的事實。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30] 傅澤民、蘇軍瑋，《抗衡？扈從？小國的第三條路：以台灣的大陸政策為例》（臺北市：中國政治學會，2011 年 10 月），頁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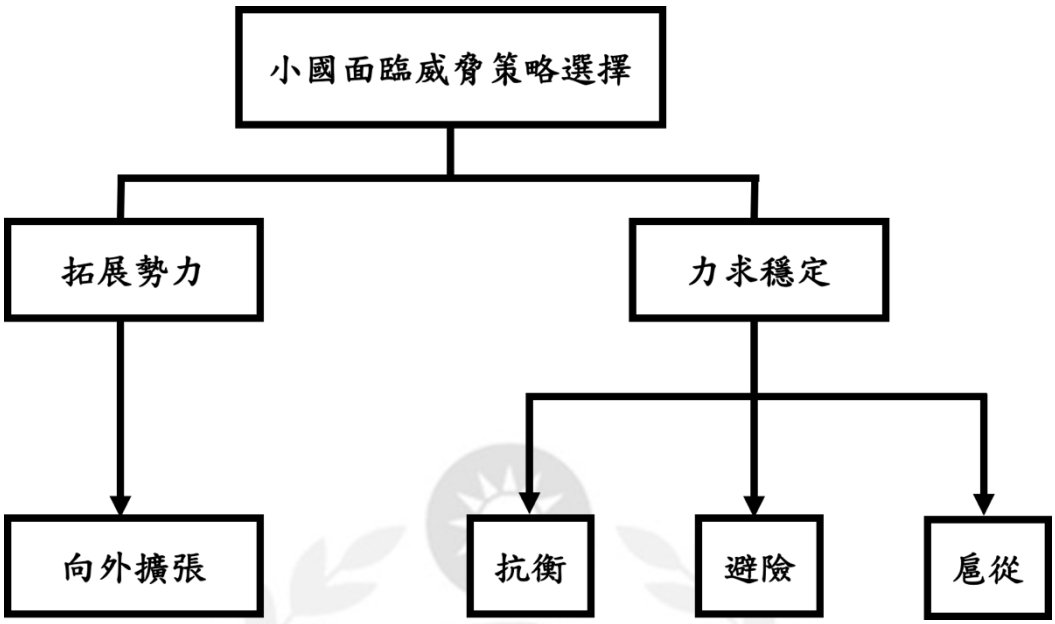

圖 2 - 2 小國面臨威脅可能採取之策略

資料來源：傅澤民、蘇軍瑋，《抗衡？扈從？小國的第三條路：以臺灣的大陸政策為例》（臺北市：中國政治學會，2011年10月），頁4。（筆者修改後自行繪製）

小國若採取抗衡策略，係屬於力求穩定中最為積極的方法，展現出小國全力自我防衛的決心，並且願意承擔守護國家所帶來的成本。就現實主義而言，會採取這樣的策略原因有二：第一，小國本身國力強勢，評估後能與外來威脅相互抵制；第二，小國持有外來威脅的所需利益，若小國毀滅對於外來威脅會有重大損失。再者，採取扈從策略的小國，即是順從威脅或是追隨強國的行為，盡量避免與外部威脅發生衝突，同時也未採取積極的安全防衛措施。然而，選擇避險策略的小國，即是在抗衡與扈從之間，也可稱為『軟性抗衡』（soft balancing），這樣的選擇則是同時考量到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為主，不與外來威脅交惡，同時尋求最適立場，多結盟友、建立新的外交關係，但這樣的選擇通常是在外來威脅強度較低的狀況下，小國能透過這樣的方式來與外來威脅獲取經濟利益與保全國家安全；若當外來威脅強度提高時，小國亦能予以嚇阻或抗衡。

第三節　巧實力的內涵及運用

《孫子兵法・謀攻篇》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敗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31]孫子說：舉凡用兵的原則，要不戰而屈人之兵，這是戰爭中的最高境界。發動戰爭的最終目的不是打勝仗，而是為了安國、保民，無論發動哪一種形式的戰爭，皆要犧牲國家財務與付出生命，來換取所要達到的目的，即使能百戰百勝，但這些犧牲都是無法避免的。

孫子認為大至敵國，小至敵卒，若能不戰而使其屈服，藉此能達到發動戰爭的目的，而不傷一兵一卒，這才是用兵之策中最好的。在歷代的戰爭中，許多良將與謀臣都是把重心放在戰場之外，主張以武力威脅與政策攻心兩相結合，曉以大義、說以利害、施以恩惠、以敵制敵等等，都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佳案例。

孫子的話與後來約瑟夫・奈伊所提出的巧實力概念，可以說是古今前後呼應，攻心為上、攻城次之，硬實力與軟實力的相互結合，由此可以清晰明瞭軟硬兼施的力道遠比單一面向的力量還要來得有效率。在面臨「全球治理」的時代，各國之間的互動與牽制性也相對提升，國際間也多以合作取代衝突，各國必須共同發展，共創國家利益，國家若能善用巧實力概念，不僅能與其他國家和平相處，亦能獲得國家相對的利益。

1990年，約瑟夫・奈伊先後發表了〈軟實力〉（Soft Power）、〈世界力量的本質正在改變〉（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等文章，認為軟實力是

[31] 孫武原著，陳書凱編譯，《這樣讀孫子兵法最輕鬆》（新北市：新文創文化，2017 年），頁 74。

一種文化的吸引力、意識型態與國家力量[32]。他認為軟實力意指國家依靠文化和理念方面來獲取影響力的能力，用以「經由吸引力，而非強迫，得願以償」（get what 'they' want through attraction rather than coercion），因為時代改變了，組成國家實力的因素也越來越多元，從16世紀的金、銀等稀有礦物、18世紀的工業進步，到21世紀的實力多元性，有別於過往能影響國家實力的有形資源（tangible resources），目前更注重得是吸引力（co-optive power）。

奈伊在2000年的《全球化世界的治理（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一書中指出，全球可以利用網路創造「軟實力」，且美國並非唯一擁有軟實力的國家[33]。國家軟實力主要是由文化、政治價值觀、外交政策等等所構成，文化是來自社會長時間累積而成的歷史傳統或風俗習慣，賦予社會意義與價值，當一國文化普遍受到各國認同時，該國的文化就具有強勢影響力，也就是奈伊所強調軟實力的重要。然在2002年，奈伊在《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為何美國不能專斷獨行（*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一書中，提到美國在全球化的時代下，依靠著自身的強大，過分強調單邊主義，導致力量逐漸地衰弱。911事件只是一個前兆，美國應該著重點於軟實力的強化，其實美國本身的文化與價值觀等軟實力已經在國際上獲得很大的影響力與吸引力了，但後來卻只著眼於使用硬實力（尤其是軍事及經濟手段），導致國家影響力日益衰退。然而美國真正所要面對的威脅，其實不是其他正在崛起的國家，而是自己想要獨霸全球的慾望[34]。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美國光靠一己之力是無法解決所有國際金融、全球氣候暖化、毒品走私等國際議題的，美國不能再

[32] Joseph S. Nye, Jr.,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5, No. 2, 1990, p.188.
[33] Joseph S. Nye, Jr. and John D. Donahue,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New York: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pp.6-7.
[34] 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ix-xiii.

像過往一樣專斷霸道，反而是需要尋求更多合作機會來解決全球所需要面對的問題。因此，奈伊於2008年重新定義「巧實力」一詞，將其界定為「結合硬實力與軟實力資源為有效策略的能力」。並將巧實力與軟實力做清楚的區分，巧實力是一種描述，同時也是一種評價，且適用於任何國家（以及非國家行為體）[35]。例如，小國能發展出巧實力戰略來維護國家和平與穩定國家發展，相同地，崛起中的大國-中國大陸，除了積極發展經濟與軍事硬實力，同時也投資軟實力發展，進而發展出巧實力戰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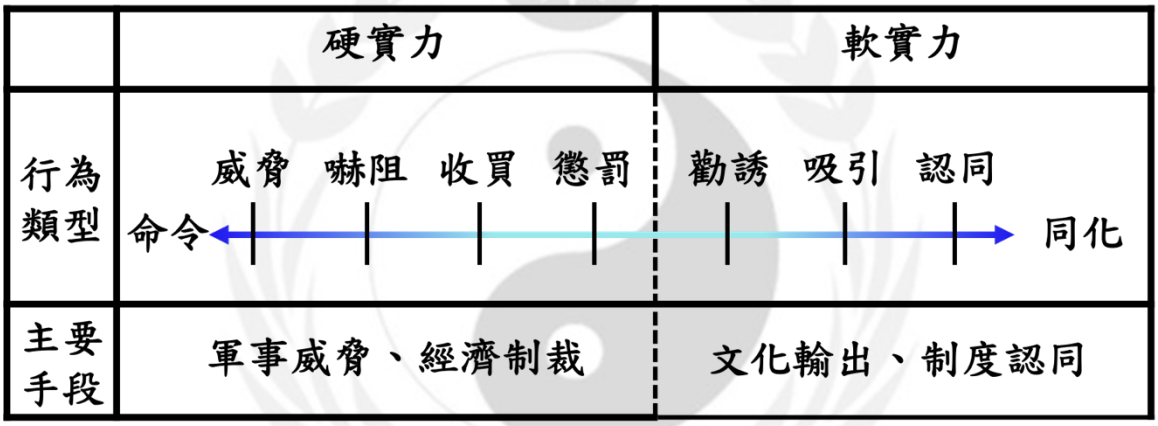

圖 2 - 3 權力的內涵

資料來源：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8.（筆者修改後自行繪製）

所謂實力，就是通過影響他人來達到你期望的目標的能力，這就要求你將所有能用的資源都用上，包括政治資源、軍事資源、以及與軟實力相關的資源，但是在使用這些資源的過程中，你必須讓這些資源相互之間形成支撐（如圖2-3）。硬實力與軟實力之間是有密切相關連的[36]，因為兩者都是藉由能影響他人的行為來達到目的的能力，差別在於行為的本質與資源的有形與無形。約瑟夫・奈伊將硬實力與軟實力繪製成權力光譜，用來解釋硬實力與軟實力之差別，硬實力通常

[35] 約瑟夫・奈伊著，李靜宜譯，前揭書，頁 47。
[36] 約瑟夫・奈伊著，吳家恆、方祖芳譯，《柔性權力》（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6 年），頁 36。

為有形的因素，如軍事與經濟，而軟實力則為無形的因素，如制度、價值、文化等等，是指通過吸引而非依靠強迫或者利誘而對他人產生影響，獲得自己期望結果的能力。但權力因素與權力行為不能混為一談，光是利用有形與無形來界分硬軟實力，則無法完全概述。因為強大的軍事硬實力也可能產生出軟實力，兩者其實是共存的。例如：強大的經濟力不僅可以作為經濟制裁及收買的手段，同時也能成為博取好感的來源。整體來說，行為類型與手段之間的關聯性是能相互影響的。

而當今我國相對於中共，不僅在國際認同、軍力制衡、經濟力量等方面都屬於較弱勢的一方，若能夠巧妙地運用巧實力戰略於兩岸之間，尋求抗衡點來獲取最大利益，創造有利局勢，對於我國國家安全與國家發展必定能創造出相當穩定性（如圖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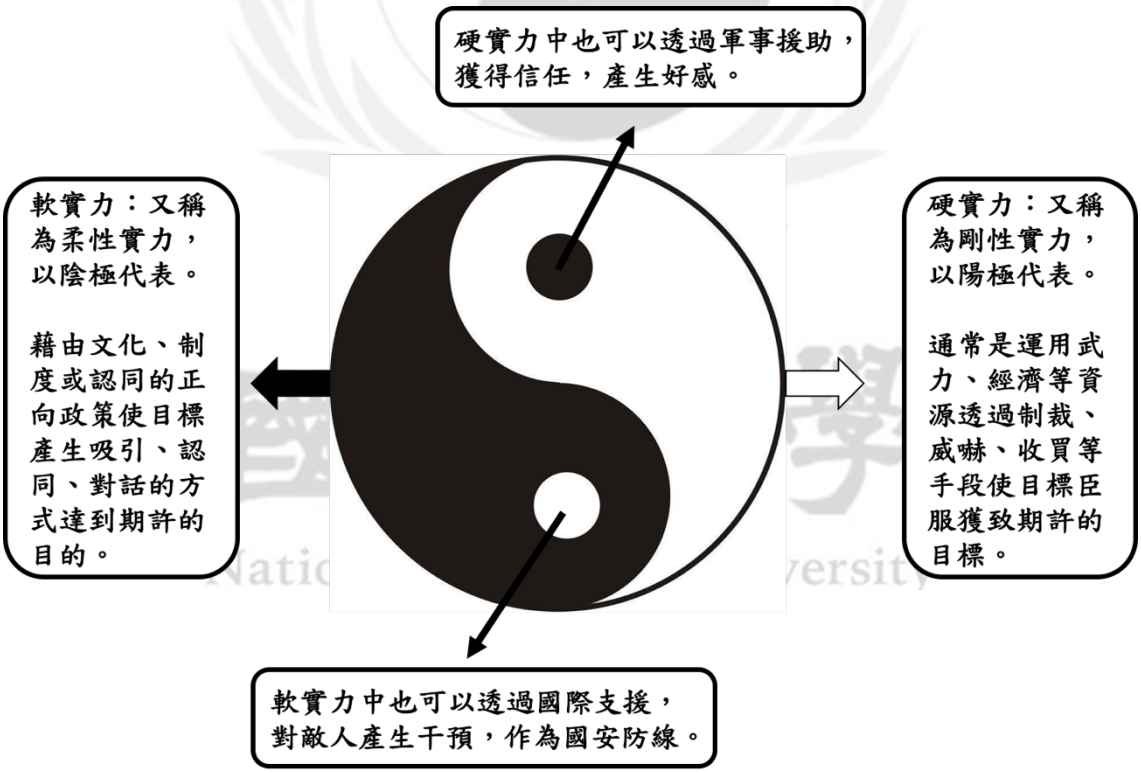

圖 2 - 4 巧實力概念圖

資料來源：蔡侑諳，《從巧實力觀點探討我國國家安全-以「三道防線」為例》（桃園：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與國際事務碩士論文，2013年），頁12。

奈伊提出「巧實力」一詞，雖然出發點為美國如何在未來的國際政治版圖上永續發展，持續獨霸全球，但這樣的戰略決策卻也是適用於小國，且越能展現其國家特色與決策選擇的正確性。新加坡致力於軍事發展，同時也在教育上成為東南亞的指標；瑞士實行徵兵制建立全民國防，並透過銀行業的發展在世界經濟上佔有一席之地，國內的成熟公民素質也是世界民主的標榜；挪威透過加入北約，強化自我的軍事能量，進而發展前瞻政策增強軟實力的發展。以上小國雖然在國家資源與國外壓力雙重壓榨下，各項表現皆無大國亮眼，但卻憑靠量身打造的「巧實力」戰略下，發展出屬於自己國家的特色與不可取代性。而我國在相似的背景下，若能借鏡其他小國的成功，相信在兩岸及國際上一定能在創造出亮眼的成功模式。

我國必須突破當今國際情勢的限制與障礙，大國壓迫小國，使得小國的經濟力與軍事力居於弱勢，雖然國際上有許多小國的成功案例可供參考，但是時、地、物大不相同，只有善用客觀的獨特條件，加上主觀的決心與努力，才能達成突破困境的目的。大國憑藉著人口多、資源豐富、經濟規模大，要邁向富裕的國家之路實屬不難；小國的資源匱乏、人口少是天生的不足，但可以憑藉著「施巧勁」，作為一個人口小國，我國要以小博大，只有靠「巧實力」[37]。

於2017年11月06日，我國《中國時報》記者江靜玲於美國專訪到約瑟夫・奈伊，並詢問有關巧實力的重要性與美中巧實力的剖析[38]。奈伊指出硬實力固然是關鍵，但軟實力在21世紀會越來越重要，進而結合兩者的巧實力也會成為現代化國家不可或缺的力量；他認為川普政府並不懂軟實力的重要性，偏愛硬實力，而

[37] 鄭志凱，《小國大想像：創新開業，開發以小博大的巧實力》（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16 年），頁 34。

[38] 江靜玲，〈軟實力之父奈伊 剖析美中巧實力〉，《中國時報》，民國 106 年 11 月 06 日。參見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1106000970-260119，瀏覽日期：民國 107 年 3 月 5 日。

這樣的政策已經對於美國形象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反之，中國共產黨從胡錦濤十七大開始，已經了解增強硬實力會增加鄰近國家對於中共的畏懼，若能同時增加軟實力，減少鄰近國家組成同盟來對抗中共，將軟實力結合硬實力，進而同時增強實力也吸引其他國家，這就是巧實力。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九大上，已將「軟實力」列入中國共產黨黨綱，並指出若國家的軟實力增強，社會文明將會達到新的高度，且預計於2035年實現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標竿[39]。

奈伊也提出美中兩強對峙的結果可能產生「金德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40]，主要是在說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金德伯格把在20世紀19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歸咎於國際領導者的青黃不接，指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搭慣了便車，不願意擔起國際責任，而導致經濟大恐慌，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再次發生。奈伊指出中美兩國必須學會合作，建立並提供國際公共財，包含國際和平秩序、開放的貿易體系、自由航行、產權保障、穩定的匯率…等等，並且扮演全球信用體系擔保人的角色等，擔任起超級大國該負起的全球責任。

針對臺灣的部分，奈伊也有以美國的角度提出一些看法，首先同意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其次不支持獨立或者使用武力，因此雙方應該讓時間來解決這個問題，不應把臺灣當成議價籌碼，然而臺灣的自由媒體和民主選舉都有助於創造臺灣的軟實力，這是臺灣的比其他國家優良的政治資本。最後，奈伊特別指出一個盲點，軟實力概念經常被誤解成任何非強制性的東西。事實上，是意指著吸引力和說服力，許多國家都有軟實力，吸引力來自各層面和方向，然美國的軟實力是來自公民社會，而非政府。

綜上所述，「巧實力」一詞是由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奈伊所提出的，著重在

[39] 林麗香，〈軍事軟實力的發展與作為〉，《國防雜誌》，第30期，民國106年9月，頁25-36。
[40] 曾怡仁、許書豪，〈試論金德伯格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思想〉，《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2 期，民國 100 年，頁 137-140。

於硬實力與軟實力的相互結合。硬實力指靠高壓手段或勸誘達到目的，可類比為「以力服人」，擁有硬實力的一方，往往可以藉由高壓手段立即獲取短期利益，但卻未必能確保長期利益。軟實力指在沒有明顯威脅或交換條件情況下，說服合作夥伴達成目的，類似「以德服人」。軟實力以共創相同目的，創造共同價值為著力點，目標一致，容易合作，但若完全依賴軟實力，凝聚力較弱，一旦外力介入，合作關係較易生變。而軟、硬實力比重調整的關鍵在於軟實力的穩定性。軟實力若無法持續，代表不穩定的均衡點，隨時有失衡的可能，一旦失衡，軟實力將隨之失效，巧實力將退化為硬實力。巧實力是將競爭策略轉為合作策略、競合策略，靈活運用硬實力、軟實力兩種力量，軟硬實力的比重，視破局成本而定。策略運用為軟硬兼施，胡蘿蔔與棍子並用。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第三章　瑞士與我國之巧實力比較分析

第一節　瑞士特殊國際地位與巧實力案例分析

壹、瑞士之特殊國際地位

當提到瑞士（Switzerland），一般人的印象不外乎是人間天堂、政治模範生、最富裕的國家等，當地人在外界的眼光看來形象也是近乎完美，不論是我們所熟知的鐘錶業、金融業等等，都造就了瑞士巧實力的具體展現。尤其瑞士是第一個「永久中立國」（Permanent neutral country），因此而造就瑞士在國際上有如此特殊的國際地位。

一、就國際法定義而言

針對「永久中立國」一詞，國際法將其定義為：它的獨立性和完整性是完全由條約擔保的，條件是它必須承諾不參加軍事同盟（除抵抗攻擊外），而且也不承擔間接地捲入戰爭的義務[41]。瑞士位處於西歐中部，東鄰奧地利、南接義大利、西臨法國、北靠德國，同時也是穿越阿爾卑斯山脈的必經之地，這樣地理位置也讓歐洲各國從中世紀開始就相爭力圖奪下這塊具有戰略意義的土地。面對這樣的威脅，在1291年，施維茨、烏里、尼瓦爾登三州結成永久同盟，目的是共同對付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擴張，此即瑞士之前身。瑞士人意識到他們不可能和其它歐洲強國在軍事上相抗衡，必須在夾縫中求生存，於是在1515年放棄領土擴張政策而宣布中立。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二、就歷史發展而言

此後，瑞士的國土上又進行了著名的「三十年戰爭」，1648年戰爭結束時，《西發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承認瑞士正式獨立。另於1798年，拿破崙

[41] 陳治世，《國際法》（臺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 年），頁 93-95。

率領軍隊大舉入侵瑞士，直到兵敗滑鐵盧，法國人才全部撤出，在經過多次劫難後，瑞士人開始謀求一個永無後顧之憂的安全地位。戰爭結束後，1815年，《維也納會議宣言》最終宣布瑞士成為歐洲的永久中立國，瑞士也正式將中立入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1919-1920年的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國際上也正式承認瑞士的中立。瑞士自此後一直奉行中立政策，並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保持中立。近年來，瑞士逐步調整外交政策，也在2002年正式加入聯合國，正由傳統的保守中立向「積極中立」前進。

就歷史上來看，其實不單單只有瑞士提出永久中立國的要求，也有其他國家（瑞典、芬蘭、奧地利、愛爾蘭、哥斯大黎加、土庫曼）提出相同的要求；然就國際法而言，國際承認的永久中立國就只有瑞士一國而已。而瑞士從1815年開始，之所以能免於一戰及二戰的波及，是因為瑞士有足夠的本錢能保持中立立場。主要原因是瑞士的複雜地形與瑞士人驍勇善戰的精神，而瑞士的傭兵在世界上是聞名遐邇的，在中世紀後期，羅馬教皇的侍衛隊就是瑞士的傭兵。法國大革命中，搏命地保護國王到最後的也是瑞士傭兵；直到目前，羅馬教皇的衛隊仍是瑞士的傭兵。從此可見，瑞士人的戰鬥精神，是歐洲地區有目共睹的。

三、就國防政策而言

瑞士之所以能維持永久中立國，其基礎主要建立在－武裝中立。瑞士的武裝部隊參謀長曾說：「國防國防，一國豈能無防？無防豈有中立？瑞士要想保持永久中立的地位，要想繼續享受百年和平，不但不能徹底廢除軍隊，反而要把瑞士國防軍建得更加強大！」，可見國防對於瑞士中立的重要性[42]。瑞士的國防形同刺蝟一般，不主動侵犯別人，但若遭別人侵犯則會惹來滿身刺，簡言之，就是利

[42] 陳虎，〈永久中立國？瑞士憑什麼？〉，《壹讀》，民國 106 年 01 月 18 日。參見 https://read01.com/zh-tw/5ROgy2.html#.WqZWlxNubOQ，瀏覽日期：民國 107 年 03 月 12 日。

用武裝力量來保護中立國的地位，不讓來犯之敵輕易撼動瑞士人所努力維持的中立國。瑞士的腹地小、地形險峻、資源匱乏、近鄰強國，致使國家的國防政策，採取全民皆兵，利用最少的資源來達成最大的效益。

瑞士憲法規定年滿20至42歲成年男子需服兵役，接受完15週的新兵訓練後列入編隊，進而回到社會，期間還必須不斷往返回部隊複訓，戰時若有需求則隨時投入戰場。在戰略方面，瑞士採取總體防禦戰略，瑞士的國小力薄，且需奉行中立政策，不能締結盟友來打擊外患。因此，特別重視總體防禦的戰略，並認為平時的戰爭準備就能決定能否達到威懾的目的。也有人比喻瑞士的地理如同乾酪一般，平時的居民大門卻是戰時的軍營門口、平時的居民倉庫裡面卻停著戰時所需的飛機或坦克，為了因應這樣的國防政策，瑞士擁有世界上最完善的地下遮蔽系統。

四、就多元民族而言

就公民文化而言，瑞士佔地面積41,285平方公里（臺灣35,882平方公里），面積與臺灣相差不遠的土地，竟化分成4個語區、2大宗教、26個邦州。在這樣的環境下，面對差異性而言，遇見與自己不一樣的事物可以說是司空見慣了；也因此，造就瑞士人彼此間能擁有高度的包容性。

對於習慣單一民族或文化的族群而言，有著不同的語言或想法，就會產生分歧，但瑞士人清楚各語區與邦州之間的差異性，「多元文化並存」是瑞士的常態，但對於其他國家而言則是「瑞士特例」。[43]每個國家都有截然不同的發展歷程與特性，因此凝聚瑞士人民的不是相同的語言和文化，而是相同的價值。綜觀歷史，瑞士境內曾經發生過兩大宗教的戰爭，以及德語區與法語區在第一次世界

[43] 陳雅惠，〈瑞士分裂中？－不一樣，就是不團結？〉，《換日線》，民國 106 年 07 月 13 日。參見 https://crossing.cw.com.tw/blogTopic.action?id=617&nid=8288，瀏覽日期：民國 107 年 03 月 08 日。

大戰期間也出現嚴重對立，如今卻成為世界聞名的和平國度。

貳、瑞士巧實力案例分析

瑞士除了因為中立國的名稱舉世聞名以外，國內還有許多產業，也是在國際上赫赫有名的代表。瑞士鄰近有許多國家經濟體皆超越瑞士，相比之下，瑞士需要依靠其他產業才能顯現出屬於自己的瑞士特色。哈佛大學教授李維特（Theodore Levitt）曾說：「長期的成功，來自於持續專注在正確的事物上，每天在一些不起眼的小地方做出改進」。[44]因此瑞士之所以能在歐洲經濟區域甚至是全球的經濟體系下，佔有一席之地，是因為瑞士把主力投注在某一些特定行業裡，並且以精緻、創新、獨特的創業精神來形塑屬於瑞士的產業、打造自己的「品牌」、展現瑞士巧實力的精髓。

一、鐘錶業

瑞士鐘錶的名聲是其來有自的，起初，在13世紀，一些專門製作金銀首飾的工匠已經默默在日內瓦萌芽；到了15世紀，製作首飾的技術成了專門的行業，所產製的各類首飾、宗教藝術用品精緻美觀，在歐洲各地暢銷。接著，歐洲鐘錶在16世紀初文藝復興的故鄉義大利問世，後來逐漸轉傳到法國、德國和瑞士日內瓦。瑞士鐘錶業約莫在16世紀中葉出現在日內瓦，開始的發展就和過往文化藝術與首飾技術有著密切的聯繫。在16世紀末，日內瓦手錶已經因高質量而享有聲譽，而瑞士鐘錶匠們於1601年創建了日內瓦鐘錶匠協會，是當時全世界範圍內成立的第一個鐘錶協會。鐘錶製造業就此在日內瓦發展壯大，可以說日內瓦是瑞士鐘錶文化的搖籃[45]。

當問起瑞士最有名的產品是什麼？多數人會不假思索地回答：「鐘錶」。除

---

[44] 鄭志凱，《小國大想像：創新開業，開發以小博大的巧實力》（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16 年），頁 179。

[45] 林郡妙，〈瑞士：永不墜落的鐘錶王國〉，《財經文摘》，第 5 期，民國 95 年，頁 80-81。

了機械與化學產業以外，鐘錶業是佔瑞士出口產業的第三名。瑞士共有600多家鐘錶產業，生產的鐘錶有百分之95出口，佔全球市佔率一半以上。瑞士之所以發展鐘錶業是因為意識到國家本身資源不足，因此利用最少的資源來創造出最大的效益。從過往的歷史當中，可以得出瑞士人非常清楚知道國家的國力不足，於是採取了中立國的政策來解決周邊強國的威脅；因為知道國家資源不足，於是將鐘錶業打造成國際公認的品質保證品牌，就是這樣的理性思考，讓瑞士能夠在諸多的威脅下，仍然屹立不搖。

事實上，瑞士人將「瑞士精神」投射在鐘錶業上，而瑞士鐘錶真正的價值在於「瑞士製造（Swiss Made）」一詞，除了是一種高品質的保證，也是一種品牌的建立。讓鐘錶業與國家形象產生直接連結，這就是巧實力發揮最佳案例。

二、銀行業

相同於鐘錶業，另一項讓瑞士人引以為傲的是銀行業。主要因為瑞士地處歐洲中部，面對鄰近強國的威脅，瑞士選擇了武裝中立政策來改變局勢，讓強國不敢隨便入侵。同時，因為戰爭的紛亂，讓選擇武裝中立的瑞士成為歐洲各個國家能坐下來談判的地方，不論是一戰或二戰，甚至是韓戰與越南抗法戰爭，都是在瑞士進行談判的[46]。到現在有許多國際組織總部，也是設立在瑞士境內；連每年召開一次的達沃斯經濟論壇，也是在瑞士召開。地理位置的緣故，讓瑞士成了歐洲各國的中繼交流站。瑞士也藉此讓國家從原本的身單力薄，成了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大國[47]。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銀行業的興起也是因為瑞士保持中立，在戰爭期間許多國家把錢存到瑞士銀行，而瑞士銀行又以極高保密性聞名，甚至許多貪污犯也將錢存放至瑞士。在全

[46] 許秀江，〈瑞士為什麼具有金融優勢？〉，《金融博覽》，第 11 期，民國 106 年，頁 22。
[47] 譚復興，〈瑞士蘇黎世的軌道交通〉，《城市軌道交通研究》，第 9 期，民國 106 年，頁 12。

球大多數的國家銀行，若政府要調查儲戶資訊，有哪個銀行敢說「不」。但瑞士銀行業情況完全不同，無論是銀行高層，甚至是家屬，都無法了解當事人的帳務訊息，這就是瑞士銀行業與別國不一樣的地方，因此被譽稱為全世界最安全的銀行[48]。瑞士銀行業如同鐘錶業的瑞士製造一般，都是高品質的保證，同時也讓銀行業與國家形象產生毫無二致的連結，這亦是瑞士巧實力的具體實現。

三、精密儀器工業

瑞士國土狹小，資源貧乏。瑞士人意識到，在既缺原料又缺能源的劣勢下，只有靠高素質的能工巧匠創造產品的高附加值，才能使產品具有強大的國際競爭力。在過去，瑞士國家的收入多半都來自工業。儘管事過境遷，很多工廠都停工關門，但工業時代依舊影響著當今瑞士人的生活方式。在瑞士，可耕地面積不能滿足大規模農業的發展所需，讓很多農民轉行進入手工業，這也為瑞士19世紀出現的工業發展打下了基礎。

瑞士有著很長時間的工業傳統，一切可回溯至16世紀起瑞士西部的鐘錶製造業。瑞士人開發出可作多種用途的精密工程專業技能，這項技能還被加以調整，以適應高科技。如今熟練的技術完全可以在電腦軟件的指導下製造機器人，甚至是運用在國防武力上。其實，在工業革命階段，瑞士跟其他歐洲國家一樣，想要發展重工業來使經濟日增月益，例如製造鐵路、汽機車，但由於內需市場過小、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轉而發展資源較少、零件較小的精密儀器工業。與其它歐洲國家一樣，瑞士已完成由製造型到知識型的經濟轉型。再者，精密儀器與裝備已廣泛應用於科技研究、國防、工業製造及人民生活等領域，其研發與製造能力是國家高新技術發展水平的重要標誌。

企業走向高度專業化道路，這些企業中許多都從事於位居瑞士的電機工程製

[48] 何農，〈瑞士的金融文化〉，《決策探索》，第 19 期，民國 106 年，頁 79-80。

造業，大多數企業都是極專業化，並以出口為主，他們通常生產精密機械設備或電子儀器等產品，雖然不是些家喻戶曉的品牌，卻出口至世界各地。而這樣的技術，在人類醫療上有相當大的貢獻。最精密的儀器已經能透過醫生的控制，來替患者進行腦部手術[49]。然而，精密儀器的成功也源自於瑞士人對於「瑞士製造」的堅持與維護，與其說瑞士製造是一種高品質保證，不如說這是瑞士人對自己的高度自我要求。而這樣的精神，已經深深烙印在每個瑞士人的心中，也在國際上成為瑞士巧實力實例。

綜上所述，瑞士清楚知道自己國家的優勢及缺點，因為資源匱乏所以經營鐘錶業；因為特殊地理位置所以經營銀行業；因為內需市場過小所以發展精密儀器工業。經由瑞士製造後，再出口到其他國家，並打造以高品質保證來吸引顧客，使商品與「瑞士」之間成為連結，成為品牌形象，這就是瑞士巧實力的展現（如圖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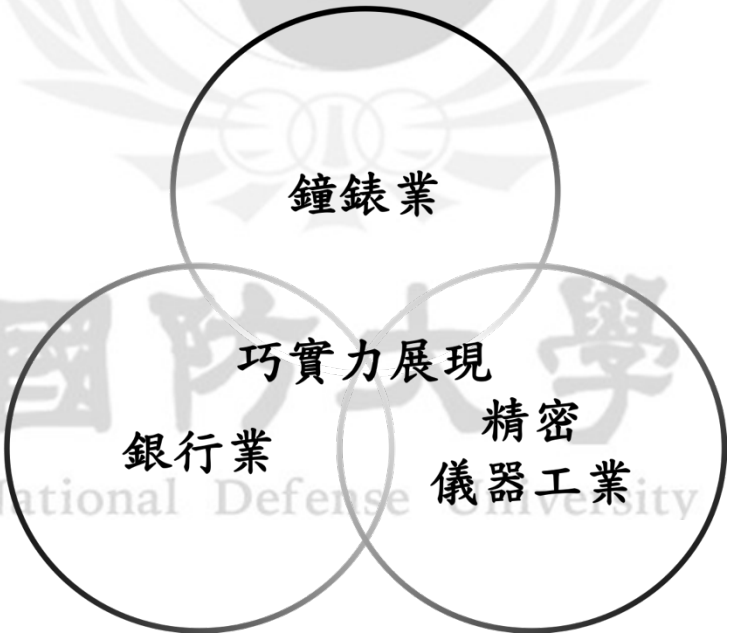

圖 3 - 1 瑞士產業巧實力展現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49] LI Guangyun , FAN Baix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ecise Engineering Surveying Technology,"，*Acta Geodaetica et Cartographica Sinica* , Vol. 46, No. 10, 2017, p. 1-5.

第二節　我國特殊國際地位與巧實力案例分析

壹、我國的特殊國際地位

世界上其實有不少國家和臺灣有類似的情況，它們自我治理（autonomy）卻不被承認有主權（sovereignty）；明明是存在的政治實體（entity）卻不被當成是國家（state）。不過，國家主權地位並不光只是邦交國數目的數學題，往往也決定於國際之間的角力[50]。然而在國際現實中，究竟誰握有中華民國主權的解釋權？依據國際法，國家構成之要素有四：（1）人民、（2）有效控制的領土、（3）政府、（4）與外國交往的權能。依照此標準，我國當然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且是完全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歷史的背景之下，就以國際條約與慣例，臺灣的法理地位與定位是非常清楚。雖然說有部分學者試圖以管轄權、統治權與主權不同的定義，來混淆我國的國際地位，但在國際法面前是不足以論證的。

一、15世紀至19世紀的臺灣

臺灣的地理位置介於中國大陸、日本與東南亞之間，是各國船隻的停泊與貨物轉運站。目前有明確文獻記載且能考證時間點，可追溯至1582年7月一場因風雨擱淺於福爾摩沙的船難後分別由兩位西班牙人神父與一位葡萄牙人教士所寫關於在臺灣75天見聞的三篇文字記錄[51]。之所以有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來臺灣，起源於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西方的市場經濟與科學新知，開始向東方擴展，當時的西方國家欲取得中國及日本的瓷器等資源，於是在亞洲尋找一塊土地作為貨物的轉運站。17世紀前期，荷蘭人進駐安平，建立據點，開始在臺灣進行傳教、貿易及各項生產活動，並招募大陸沿海地區的漢人來臺墾殖，開啟臺灣多

[50] 林志昇、何瑞元，〈台灣主權與國際地位〉，《台灣海外網》，民國 97 年 4 月 1 日。參見 http://www.taiwanus.net/roger/roger_35.htm，瀏覽日期：民國 107 年 03 月 26 日。

[51] Jose E. Borao et al.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Documents) Vol. I: 1582-1641*,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01), pp. 2-15.

族群歷史的開端。1624年，荷蘭佔領臺灣西南部（1624-1662）、西班牙則佔據臺灣西北部（1626-1642）進行殖民統治，此後臺灣成為遠東貿易重要的經濟重地[52]。之後，荷蘭人將西班牙人驅逐，統治臺灣西部的大部分。1661年4月，鄭成功率兩萬五千名將士及數百艘戰艦進軍臺灣，迫使荷蘭在1662年2月1日簽約投降，臺灣正式進入鄭氏統治時期。在此期間漢人開始大量移入臺灣。1683年，鄭克塽歸順清朝，臺灣進入清治時期。在短暫的鄭氏政權時期及清朝統治的兩百多年間，漢人移民逐漸增加，在臺灣形成漢人社會。19世紀末在帝國主義向外擴張的浪潮下，1895年，大清帝國與日本衝突，史上稱為「甲午戰爭」，清廷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戰敗。同年4月17日，中日兩國在日本下關簽訂《馬關條約》（Treaty of Shimonoseki），其第2條規定中國應將遼東半島、臺灣及其附屬島嶼及澎湖列島割讓予日本，該條約於同年5月8日生效，日本軍隊於同年5月29日，從臺灣宜蘭的澳底登陸。6月2日中日雙方代表李經方與樺山資紀在基隆外海日本軍艦「橫濱丸」上，辦理臺灣、澎湖及附屬島嶼的割讓、接收手續，日本並於壓制臺灣人民全島長達五個多月激烈的武裝反抗後，展開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53]。

二、日據時期的臺灣

1911年10月10日，以孫文為首的革命團體，在中國武昌發動武裝政變，並於1912年建立中華民國[54]。中國自從建國以後，封建帝王思想仍存在，軍閥割據，當時整個中國陷入你爭我搶的局面。最後，出現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和中國國民黨的蔣介石雙雄。毛與蔣在當年，對臺灣的國際地位與定位是非常清楚，而且明確，那就是臺灣並非中國的一部分，而是日本的領土。二次大戰結束，臺灣主權從日本手中歸還中華民國，此一轉變源於日本發動對華侵略行動。1937年7月7

[52] 林季嫻，《臺灣人地關係初探》（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07 年），頁 15。
[53] 戴寶村，《臺灣的海洋歷史文化》（臺北市：玉山社，2011 年），頁 9-16。
[54] 駱芬美，《被扭曲的臺灣史－1684～1972 撥開三百年的歷史迷霧》（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2015 年），頁 250。

日，日本率領軍隊在河北省宛平縣發動蘆溝橋事變，對中國不宣而戰。10天後，國民政府蔣中正委員長發表演說，宣示抗爭到底決心，自此中華民國不屈不撓獨自與日本抗戰四年。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海軍死傷慘重，美國立即對日宣戰。中華民國政府隨即在次日對日本、德國與義大利等軸心國宣戰，並宣布中日之間一切條約、協定、合同一律廢止；《馬關條約》當然包括在內。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發表《開羅宣言》（Cairo Declaration），具體要求戰後日本「須將竊自中國的東北四省、臺灣與澎湖歸還中華民國」（…all the territories Japan has stolen from the Chinese, such as Manchuria,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shall be restored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55]。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領袖發布《波茲坦公告》（Potsdam Proclamation），其第8條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須貫徹實施」。1945年8月14日，日本接受《波茲坦公告》，宣布無條件投降，並於同年9月2日在美國密蘇里軍艦上簽署《日本降伏文書》（Japanes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該文書第1條中載明「茲接受美、中、英、蘇四國政府領袖於1945年7月26日於波茲坦所發表及所列舉之條款」。換言之，《波茲坦公告》第8條有關《開羅宣言》之條件必須貫徹實施，係日本於《降伏文書》中所承諾之事項，日本當然必須履行，將東北四省、臺灣、澎湖歸還中華民國。不論《開羅宣言》、《波茲坦公告》或《日本降伏文書》，中華民國均將之視為具有條約效力的法律文件。美國政府除將《開羅宣言》與《波茲坦公告》編入《美國條約及其他國際協定彙編》（Treaties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Series）外，並將《日本降伏文書》收入《美國法規大全》（Statutes at Large）。是以，就國際法而言，《開羅宣

[55] 中華民國外交部條約法律司，〈臺灣的國際法地位〉，《中華民國外交部》，民國106年06月20日。參見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E5B60D75EBD02E77&sms=779A2E76271875CF&s=A421F866010C8490，瀏覽日期：民國107年03月26日。

言》、《波茲坦公告》與《日本降伏文書》皆係具有約束力的法律文件。

三、中華民國在臺灣

1945年10月25日，日本臺灣總督於臺北向中華民國政府投降。同日，中華民國政府宣布恢復對臺灣、澎湖列島之主權。嗣後，中華民國政府開始有效治理臺灣、澎湖及附屬島嶼；1946年1月12日，明令恢復臺灣、澎湖居民之中華民國國籍，開始推行民主制度，例如1946年，在臺灣舉辦省縣參議會選舉，隔年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為臺灣省政府[56]。

1949年12月，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播遷臺灣。從1945年到1949年，中華民國已在臺灣有效行使主權之作為，國際社會均無異議。例如1950年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發表聲明稱：「1943年12月1日的開羅聯合聲明中，美國總統、英國首相及中國主席宣稱，他們的目的是要將日本竊自中國的領土，例如福爾摩沙（臺灣），將歸還中華民國。美國政府於1945年7月26日簽署的波茨坦公告中，宣告開羅宣言的條件應予施行。這個宣言的條款於日本投降時為日本接受。遵照上述宣言，福爾摩沙移交給蔣介石委員長。在過去四年內，美國與其他同盟國均接受中國在該島行使權力。」，1952年，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之《中日和約》[57]，僅係以條約形式再次確認臺灣之領土主權歸還中華民國。實際上，該和約簽訂與否，並不影響中華民國對臺灣之主權，所影響者僅係中華民國與日本戰後正常外交關係之開展。

中華民國政府自1945年恢復臺灣與澎湖列島之領土主權，並有效行使管轄權，至今已逾70餘年，中華民國與臺灣之命運已密不可分。我政府依照憲法實施憲政，推行民主法治。並於1950年開始辦理縣市長及縣市議員選舉、省議員選

[56] 戚嘉林，《臺灣新歷史》（臺北市：農學有限公司，2000年），頁220。

[57] 中華民國外交部公眾外交協調會，〈「中日和約」答客問〉，《中華民國外交部》，民國 101 年 08 月 16 日。參見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53CFB45A329E6B01&sms=8BFD8EF69DF69F75&s=6AF7BADE42537535，瀏覽日期：民國 107 年 03 月 27 日。

舉，1970年開始辦理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1990年開始全面改選國會，1996年更舉行全民直選總統，將憲法「主權在民」的觀念予以徹底實現，將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共同信念實現在我國國土上。在歷史的交錯中，臺灣歷經了經濟奇蹟與政治民主化的過程。臺灣的歷史發展不論從臺灣本身的發展脈絡或放在世界的歷史脈絡來看，都有其特殊之處，也吸引著世界各國歷史學者的關注。現代的臺灣，擁有優質的公共建設、便利的運輸系統及完善的通訊服務，在面對數次國際能源危機及經濟不景氣，我們創造了舉世讚譽的「經濟奇蹟」，成為開發中國家的成功典範。凡此種種，都證明了臺灣人民憑藉著永不屈撓、奮鬥不懈的堅毅精神，創造了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的成就。在面對21世紀開展的同時，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與全球化的潮流更見風起雲湧，臺灣正面臨一個全新的政經局勢與國際競爭模式。

從上述所言可見，臺灣這塊土地的主權在掌握者的更迭之下，轉換了不少次的主權。國共內戰失利後，國民黨所主導的中華民國政府被迫退居臺灣，嗣在現實主義的國際情勢下，美國為了對抗冷戰時期的蘇聯，轉而扶植共產黨所佔領的大陸，再者，蔣委員長提出的「漢賊不兩立」政策[58]，也讓原本身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中華民國，於1971年10月25日退出聯合國。自此，中華民國存在的法理性就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打壓的著力點，外加上國際現實的趨勢性，這也造就我國特殊的國際地位。

綜觀歷史的脈絡，就臺灣這塊土地上，有多少的民族曾經在這土地上生活，並將他們所屬的文化帶進這塊土地，造就臺灣多元文化的豐富性。小小的一塊島嶼上，卻有多樣的文化薰陶，從早期的南島文化，到地理大發現的荷蘭、西班牙、葡萄牙所帶來的歐洲文化，明鄭時期大規模的開墾也將閩南及客家文化攜入

[58] 林麗容，《新台灣史》（新北市：上大聯合，2014 年），頁 31-32。

這塊土地，接續日本殖民時期於我國實施皇民化教育，也深受日本文化影響，二十世紀中葉也受戰後歐美文化的影響，淺從許多城市的古蹟，深則地方居民的生活模式，皆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因為文化、語言的多元，造成豐富的碰撞，臺灣因此同時富有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成就臺灣當前的豐富面貌。

就地理位置而言，臺灣為處於亞洲東部，居於東北亞與東南亞交會處，東接太平洋、西隔臺灣海峽與歐亞大陸相望、南臨巴士海峽與菲律賓相對、北接東海，在西太平洋從千島群島、日本、琉球群島、菲律賓等眾多島嶼所形成的島弧花綵列島中，臺灣正處於中樞位置。從地緣政治理論上來看，臺灣正好位於東亞島弧中央區域，成為亞太經貿運輸重要樞紐及重要戰略要地[59]。

貳、我國巧實力案例分析

在國際社會上，利用軟實力，可以吸引更多人認同，更容易的跟他人連結，但是如果沒有硬實力作為基礎，國家就很容易波動，甚至被併吞，要靈活運用軟實力與硬實力的搭配，這就是「巧實力」重要之處，巧實力讓你認識權力互動的潛規則，面對人事環境變化時，知道怎樣思考與安身立命，藉此你才可以預先布局、化被動為主動。而我國正是需要這樣的巧實力來化解當前的困境，在原有的硬實力作為基礎之下，搭配我國的軟實力，結合出屬於我國的巧實力，在國際上的角色由被動轉主動，跨出臺灣的新步伐。

DIGTIMES總經理暨電子時報社長黃欽勇於民國106年12月19日，主講「巧借東風-中美科技角力與臺灣產業轉型機會」，內容提到臺灣如何以科技業在中國大陸強勢崛起的情況之下，如何在中美兩個強國之間求生存，當中就有提出要運用巧實力。從原本工廠的「製造力」轉成國民的「智造力」[60]，我國社會實現了全

[59] 陳昀秀，〈海洋史的大家長-曹永和院士（下）〉，《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民國 97 年 8 月 8 日。參見 http://homepage.ntu.edu.tw/~history/public_html/tsao/tsao_talk.html，瀏覽日期：民國 107 年 03 月 27 日。

[60] 黃欽勇，《巧借東風：中美科技角力與台灣》（臺北市：大椽出版社，2017 年），頁 204。

民高素質教育，擁有來自基層的強大智慧競爭力，是中國大陸所不及的，但我國卻無法將這來自基礎的能量及國力轉換到資訊業來進行全球競爭，這是目前我國所欠缺的。

一、半導體產業

臺灣半導體的產值居全球第二，若能配合軟體的創新應用，在現代不論是人工智慧、大數據，以及物聯網的潮流中，都能有機會占有重要的一席，而半導體產業的持續成長是政府推動產業創新的重要支柱。說起臺灣半導體的故事，必須先從孫運璿說起，於1942年哈爾濱剛畢業的孫運璿，被國家機構「資源委員會」派往美國受訓，接受相當具有前瞻性的國際觀，回國之後在擔任臺灣電力公司總經理時，重建電力系統，讓脫離日本統治、荒蕪一片的臺灣，打下經濟發展的基礎。1974年，行政院蔣經國院長為了改善臺灣的基礎建設及進行產業升級，推行十大建設並且積極尋找下一個發展的重點工業。同年7月，在美國擔任研發工作的潘文淵先生向經濟部孫運璿部長提出「積體電路（IC）計畫草案」，並經孫部長召集會議拍板定案，決定發展電子工業，於是臺灣半導體產業正式萌芽[61]。

1960年代，美國在亞洲尋找低成本製造機會，而半導體係屬於人力組裝組合元件模式，是低成本、高勞力特性產業，臺灣也藉此開始發展半導體；當時在技術轉移下，將勞力密集、技術層次較低的封裝業轉入東南亞開發中國家。當時，臺灣的IC設計及技術研發是落後的，但在製造上卻有相當的水準及優勢。張忠謀院長來臺灣沒多久，就在李國鼎政務委員的大力促成下[62]，決定成立世界第一家專業晶圓代工廠，以充分發揮臺灣在製造方面的優勢。1987年，現今世界晶圓代工市占率第一名的「臺積電」就此誕生。也因為有了專業的晶圓代工廠，IC設計

[61] 丁志華，〈矽晶・電子：矽說台灣－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與全球地位〉，《科學發展》，第541期，民國107年，頁21-29。

[62] 趙芷菱，〈打造台灣奇蹟 現代化之父李國鼎〉，《新紀元週刊》，第392期，民國103年，頁10。

公司只要把所設計的產品委託製造，不需自行設立工廠，於是臺灣的IC設計公司如雨後春筍般一家一家地設立。造就了今天臺灣半導體產業產值居全球第二名的規模，主要是源自1970年代，在蔣經國院長的支持、孫運璿部長的推動、海外學者的協助及國內外人才的投入下，加上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建立，更促成垂直分工的創新商業模式。

臺灣經濟因為半導體，從原本的農業社會轉型到工業社會，再從傳統工業升級到高科技工業，同時讓原本經濟落後的臺灣晉升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創下經濟奇蹟。臺灣正因為特殊的地理位置，成為亞洲地區發展科技業的基地，藉此臺灣經濟也從此蓬蓽生輝，這也是臺灣利用巧實力成功的實例。

二、捷安特腳踏車製造業

捷安特腳踏車的前身－巨大機械工業公司於1972年在臺中縣大甲鎮由劉金標創立，主要經營腳踏車及零件加工銷售和製造。巨大之所以取名為巨大，主要是因為臺南巨人隊於1971年抱回世界少棒賽冠軍，於是劉金標想借用巨人隊響亮的名氣，以巨人工業登記申辦公司，但是因有人捷足先登了，因此而改名為巨大機械工業。在1970年代中期，美國腳踏車第一品牌Schwinn與巨大機械工業公司開始合作，向巨大機械工業公司下單，在接收訂單不久後，巨大機械工業公司就開始從原廠代工製造起家，整體營運情況也開始漸漸好轉，但於1980年，Schwinn公司卻突然轉往大陸投資，因而終止了與巨大機械雙方的合作，因此遇到了空前的危機。[63]

1986-1989年，巨大機械工業公司與美國Schwinn終止了合作，但這也使此巨大機械積極開始建立自己的品牌全球知名度，這時可歸為捷安特公司的轉型期。第一次在國外設廠，於1986年在荷蘭設立捷安特歐洲總部，踏出在海外自創捷安

[63] 魏錫鈴，《騎上峰頂：捷安特與劉金標傳奇》（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2009 年），頁 35。

特品牌的第一步，隨後於隔年成立美國捷安特公司；1988年分設捷安特英國、德國、法國公司；1989年成立捷安特日本公司，1999年再設捷安特澳洲及加拿大公司，全力建立全球行銷組織地點，最終成為臺灣最大的自行車車廠。巨大從原本保守的策略轉向積極的行銷手法，由生產者的角度轉向消費者導向，正常利潤轉向經濟利潤。於1994-1999年，為了因應全球經濟與社會競爭環境的變化，尤其是大陸地區崛起，加速拉大與競爭者的差距，而巨大也於1994年上市，成為大眾化公司，是為巨大重要的里程碑[64]。

說起腳踏車必然會聯想到捷安特，劉金標董事長認為想要成功就必須自建品牌，取得自主經營，看的是未來的長期經營利益，捷安特不管是現在或者甚至是未來都是腳踏車廠業的指標型企業，當初捷安特決定從代工轉變自創品牌，各大廠商都不看好，但近年來國內慢慢知道自創品牌的重要性，政府也漸漸重視對各大自創品牌加以補助，所以在2003年時劉金標董事長提出了一個口號：「巨大不強調No.1，而是追求Only 1！」。

巨大早在1981年就有要從「製造的捷安特」轉型為「品牌的捷安特」的想法，另一個重要的關鍵，就在於品牌定位策略成功，因此造就巨大能穩健在自創品牌之路上發展。在進入國際市場時，臺灣許多自創品牌的業者，往往基於考量價格競爭力，將品牌定位在低價或低階市場，不過巨大卻反其道而行，不但在海外布局的腳步疾如風，同時一開始就將捷安特品牌定位為國際市場的高級品牌，讓GIANT的品牌形象受到海外市場的青睞。另一個成功因素，是巨大海外子公司大舉聘用當地人才，善用最了解當地市場情勢的人才，以利進軍國際市場。[65]

捷安特沒有因為與美國失去合作後，而就此罷休，反而是積極拓展市場，從

---

[64] 陳衍翰，〈向台灣自行車教父學經營心法要當 CEO，先放大格局〉，《30 周刊》，第 53 期，民國 98 年 1 月 1 日，頁 40-42。

[65] 林靜宜，《捷安特傳奇－GIANT 全球品牌經營學》（臺北市：天下文化，2008 年），頁 130-139。

原本的製造商，成為品牌大廠；藉由轉換經營模式，成功創立「捷安特」品牌，聞名全球。捷安特集團在海外的員工達八成以上，讓全球各地、分屬不同文化背景的員工都具有相同團隊的合作精神，主要是靠相互信任為基礎，並且建立共同目標，捷安特前執行長羅祥安指出，團隊是把對的人聚在一起，讓大家能夠發揮長處，而領導人則是協助他們成就事情[66]。也就因為這樣的精神與堅持，造就了全球第一的腳踏車品牌，同時也是讓全球看見臺灣人巧實力的展現。

三、國防科技工業

《國防法》第22條提到：「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應依國防政策，結合民間力量，發展國防科技工業，獲得武器裝備，以自製為優先，向外採購時，應落實技術轉移，達成獨立自主之國防建設。國防部得與國內、外之公、私法人團體合作或相互委託，實施國防科技工業相關之研發、產製、維修及銷售。國防部為發展國防科技工業及配合促進相關產業發展，得將所屬研發、生產、維修機構及其使用之財產設施，委託民間經營。前兩項有關合作或委託研發、產製、維修、銷售及經營管理辦法另定之。」[67]，依《國防法》第22條規定，結合民間產、學、研技術能力，積極建立武器研發、生產與全壽期支援能量，並以國機、國艦等指標專案，結合各部會資源，以需求引導民間產業參與，達成振興國防產業及國防自主目標[68]。

在1993年，德國將「國防工業」定義，包括直接間接有助於武器、裝備、軍品生產製造之輕重工業、礦業、紡織業、農業等，凡能加強國防武力潛力者皆屬之，另先總統　蔣中正先生也曾指出：「發展國防工業計畫，應側重於重工業以

[66] 陳柏如，〈羅祥安談捷安特的品牌經驗〉，《自行車市場快訊》，第 130 期，民國 99 年，頁 34-37。

[67] 陳仁帥，〈我國武器獲策略之研究兼論國防法 22 條〉，《空軍學術月刊》，第 545 期，民國 91 年 4 月，頁 18-36。

[68] 中華民國 106 年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 106 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市：國防部，2017 年），頁 93-95。

便生產新武器，加強國防軍戰鬥力，其目的以養民為本位，力求民生與國防合一」。因此，發展國防自主有兩個主要目的，一是「為了擁有自主性的軍備，保衛臺灣本土安全」，另一則是「帶動國家經濟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現實主義理論主張國家為主要行為者，冷戰時期的國際政治處於衝突狀態，因此國家須將權力與利益極大化，才能確保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中確保自己的安全與生存。在衝突不斷的國際環境下，將經濟力量、軍事力量與政治力量相結合，才能確保國家安全與維持國際和平的有效手段。然國民政府遷臺初期，我國防軍備完全仰賴美國，直到中美斷交後轉由我國自行規劃，以因應對岸中共的威脅。

因此，我國為籌建符合聯合防空作戰需求之未來戰力，規劃由中科院在IDF研發基礎上，整合國內、外系統供應商研製新式教練機及關鍵組件平行研發，執行現有戰機性能提升。其次依國防科技規劃期程，為了凝聚研製能量，並著手發動機研發計畫及建案，已啟動戰機關鍵技術研發工作。新式高級教訓機委製案已於106年2月7日由總統蔡英文主持「新式高級教訓機委製及合作備忘錄簽署啟動典禮」，宣誓共同發展航空產業之決心；並由空軍與中科院簽署 66 架高級教訓機委製協議書，整合國內航太產業能量，以建立長遠之產業供應鏈[69]。

我國於106新增「新型兩棲船塢運輸艦、高效能艦艇後續艦、快速布雷艇」建造案及「潛艦、新一代飛彈巡防艦」合約設計案。106年3月21日總統蔡英文主持「潛艦國造設計啟動及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中科院與臺船公司簽署潛艦國造設計啟動，宣示潛艦國造正式啟航，積極推動國艦國造。我國已具水面艦自製能量，國內造船業陸續參與多項水面艦艇建造，造艦品質已逐漸成熟，國防部依

[69] 王大宇、蘇柏誠，〈國機國造引進智能製造策略研析〉，《空軍學術雙月刊》，第 661 期，民國 106 年 12 月，頁 74-88。

作戰需求規劃未來新興兵力，採批量、循環及長期方式自製，以滿足建軍備戰需求[70]。

國防現代化倚靠的是科技，同時也是各項產業的源頭，若無國防需求，相對地就不易帶動科技快速的成長，相同地，無科技之力的藉助，武器裝備就不易有創新的成長，從世界先進國家的國防工業發展歷程中發現，各國物質條件與科技能量不盡相同，但基於國家安全利益，在國防科技發展上，訂有明確的發展目標、投入固定的預算研發，不僅能使國防武力能持續成長，亦能吸引民間相關企業投資，營造國內產業有利環境，達成國防與國內經濟雙贏的效果。我國經過翔實的長期檢討，考量戰力維持與增長需求，鼓勵民間企業加入、帶動國防武力裝備發展，一方面滿足國軍作戰需求，另一方面連動周邊產業，相對提升經濟能力，以達國家所求之目標。依靠國防工業的提升，帶動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僅讓國家硬實力提升，也讓在軟實力方面吸引其他國家，展現出我國的巧實力。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70] 胡信正，〈美國、歐盟、中共、南韓及我國之國防產業發展研究〉，《聯合後勤季刊》，第 27 期，民國 100 年 11 月，頁 77-95。

綜合上述，我國當時符合低成本、高勞力的半導體產業之背景，接下美國於亞太區域的製造國，加上我國當時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菁英學者的投資眼光，進而在打造屬於臺灣自己的品牌；相同捷安特腳踏車並未因與美國失去合作而倒下，與當時大量生產、降低成本產業的主流反其道而行，藉由以往固有的技術，加上經營者的產業轉型，拓展國外市場，吸收當地人才，成功打造出國際品牌；國防科技工業的轉型，從原本向國外購置軍武，轉由國內製造生產，不僅同時強化硬實力，也讓國內各項產業相繼投入，這就是我國巧實力之展現(如圖3-2)。

圖 3 - 2 我國產業巧實力展現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第三節　兩國巧實力之整體發展與比較分析

壹、瑞士巧實力SWOT分析

瑞士的領土狹小、資源匱乏、內需市場過小，對於鄰近的歐洲強國而言，瑞士的生產力根本不足以威脅到其國家的產業。瑞士若與鄰近大國發展相同類型的產業，就人力、資源、市場來說，瑞士發展重工業或與其他鄰國相同產業只會入不敷出。就鄰國大國而言，德國、法國在國際上皆有一定的競爭力，主要原因是大國在國際上本來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再者是瑞士要與鄰近大國相比是以小博大，絕對沒有一定的優勢。瑞士的優勢是在國際上是個永久中立國，與任何國家皆沒有敵對關係，因此能自由的與各國交朋友，拓展自己的市場。資源不足、生產力不足也是瑞士的缺陷。瑞士經過理性的思考與判斷後，選擇以成本低、零件小的產業來創造出屬於瑞士的品牌，得到國際認同，展現瑞士巧實力靈活運用。

表 3 - 1 瑞士 SWOT 分析表

優勢 S（Strength）	劣勢 W（Weakness）
◎瑞士的中立政策，國際上能靈活的展現。 ◎所產出的產品都是高品質的保證。 ◎將產品的高品質與國家形象做結合，成功打造「瑞士」品牌。	◎國家資源不足、內需市場過小。 ◎其他產業與鄰近大國無法相比較。 ◎精細的人工成本無法降低。 ◎高品質的缺點是高價值，無法滿足到社會中下階層人士。
機會 O（Opportunity）	**威脅 T（Threat）**
◎向外拓展市場，獲取更多國家利益。 ◎持續維持高品質的品牌，達到歷久彌新的目標。 ◎打造低價位、高品質產品，符合更多人的需求。	◎大國打造相同模式，壓低價格吸引客源。 ◎科技世代來臨，產業若無轉型無法迎合市場需求。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貳、我國巧實力SWOT分析

反觀我國，我國同樣資源缺乏、腹地窄小，國內生產力也不足以鄰近國家相比。我國不僅受中共市場的威脅，日本、韓國等在亞洲地區也有一定的競爭力，不僅如此還要受到美國的牽制，我國鄰近的威脅也不亞於瑞士。小國要突破困境，就必須開發以小博大的巧實力，沒有龐大的人口、市場，小國要在鄰近大國中突破，就必須靠與別人合作，而不是在舊有的歷史框架下，劃地自限。我國地理位置正好位於亞洲地區的樞紐，往北往南都能夠順利向外拓展；相對地，我國在國際上容易受到中共的打壓，這也是我國難以在國際上順利發展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國要突破這樣的困境，可以利用軟實力來吸引其他國家，並且以硬實力為基底，靈活運用巧實力在國際上有所發展。

表 3 - 2 我國 SWOT 分析表

優勢 S（Strength）	劣勢 W（Weakness）
◎我國的地理位置，能靈活在國際上拓展市場。 ◎成為科技業基地，向外出口創造更高利益。 ◎我國包容多元民族的社會，可以吸收多國的高知識份子進入。	◎國家資源缺乏、內需市場過小。 ◎政黨之間惡鬥，無法取得共識。 ◎國際現實主義下，我國難以取得國際認同。
機會 O（Opportunity）	**威脅 T（Threat）**
◎向外拓展市場，獲取更多國家利益。 ◎利用巧實力突破外交困境。 ◎將產品與國家形象做結合，成功打造「臺灣」品牌。	◎國際上容易被中共打壓，造成外交困擾。 ◎大國掌握國際局勢，小國難以生存。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參、兩國同中存異之處

一、兩國相同之處

臺灣其實與瑞士有許多相似之處，兩國的土地面積差不多，鄰近周邊都是大國，更重要的是，兩國的內需市場都不夠大，必須倚靠出口來創造經濟成長。瑞士與我國一樣缺乏資源、腹地狹小、國內市場過小，所以無法皆在國內發展出完整系統、垂直的產業，瑞士則採取進口微小原料，打造高品質的產品，並與國家形象做結合，展現巧實力運用；而我國同樣進口原料，進而打造新的產業模式，讓我國經濟突飛猛進，不僅如此，我國也將產品與國家進行結合，同樣展現巧實力運用。兩國同樣為了突破市場困境，轉換產業模式，從資源匱乏的國家轉而成為製造產品的生產國，最後進而打造出屬於自己的國家品牌。然運用巧實力就是兩國最佳的策略選擇，同樣在強國的環伺下，運用巧實力就能突破困境，利用軟實力來吸引其他國家，減少敵人；利用硬實力來嚇阻外敵，作為國家安全的基底；再將兩者結合，形成巧實力，並靈活運用於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動。

二、兩國相異之處

不同的是，瑞士是永久中立國，我國卻因為歷史的羈絆，在國際上無法順利地進行外交；瑞士能在歐洲甚至全球靈活的進行外交工作，反觀我國受限於「一中原則」的框架下，在中共外交的打壓下，無法順利的在國際上活動。瑞士之所以能在國際上維持一定的國際能見度，主要是依靠不斷創新的思維，而創新的部分不僅僅是產品上的提升，而是著重於要有創新的銷售手段、生產模式，改變顧客對於產品的刻板印象，這樣能力也造就瑞士可以在國際上維持頂尖的地位。反觀我國，原本是亞洲四小龍的代表國家，但卻因為沒有求新求變，加上政府政策與國際現實相違背，導致國家不僅在經濟上落後，也在外交上遇到許多阻礙。

第四章　賽局理論下之小國策略選擇

第一節　大棋盤現勢下之瑞士競合策略選擇

壹、國際現勢下之瑞士競合策略

1291年瑞士三個森林州在琉森湖畔的呂特利草地締結保護結盟，三個州的阿爾卑斯山山民因對王權不滿、封建統治的反抗，建立了最早的同盟，古代瑞士的雛形就慢慢形成。幾百年來，其他邦州陸續加入小國，遂演變成現今 26 個邦州和 3 大語區。歐洲大陸戰火紛飛，大家都樂見難以跨越的阿爾卑斯山區出現一個可以斡旋、調解糾紛的中立空間。因此，從建立之初，瑞士便陰錯陽差地擁有了其他國家所不具有的屬性：多語言、國際化和中立性。現代瑞士的誕生卻並不完全是瑞士人自己的意願，現代瑞士脫胎於拿破崙建立的「海爾維第共和國」，其目的是在自由新教和天主教世界的中間地帶建立一個緩衝國。

一、瑞士穩定之政治制度

法國大革命帶來的民族主義、自由主義與山民自由浪漫的傳統完美結合，讓這些阿爾卑斯山區的人們崇尚自由、民主、獨立、地方自治，不願再委身於任何高度集權的中央政府，不管它是皇權、王權還是共和國，現代意義上的「瑞士人」和瑞士聯邦就此誕生。瑞士人主要由三種語區人種組成，德語區、法語區、義大利語區，他們保留了各自民族的特點，又兼具了許多瑞士特有的屬性。建立之初，瑞士也無法避免民族間的衝突。德語區、法語區一直離心離德，卻跌跌撞撞鬥而不破。直到二戰期間，四面全被軸心國勢力包圍，面臨亡國危險的瑞士人才第一次真正上下齊心，三天內動員60萬國民地變身正規軍，捍衛瑞士存在的價值。希特勒權衡利弊後放棄入侵，讓瑞士再一次躲過戰爭，顯現出建立中立政體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之巨大優勢[71]。

瑞士國土雖小，但穩固的聯邦制非常獨特。首先，26個州以及各州的自治市擁有極大的自治權；其次，各州和自治市直接參與政治決策。 不僅各州擁有巨大的影響力，每位公民也有重要的影響力，這是因為瑞士實行直接民主制：人民的倡議和公民投票，為公民提供了影響政府的機會。直接民主制是瑞士戰後的內聚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他包含發達的經濟水準、富裕的生活水準、先進的教育與科技水準、安全、有秩序、包容的社會環境等等，與代議制為主的世界主流不同，瑞士實行相當直接的民主制度。只要籌到足夠數量的聯署簽名，瑞士人就可以透過全民公投複決國會法案，或是提出新法案動議。瑞士人進行過許多有名的公投，其中最為人熟知的便是否決「無條件基本收入」法案，即使什麼工作都不做，每個月就能賺7.5萬元新臺幣。對於這類破壞經濟的法案，瑞士人否決起來毫不手軟，反對比例高達四分之三。不得不說，其國民素質之高可見一般。放到任何一個其他國家，這樣的直接民主制度都可能帶來重大的經濟災難。

然而，瑞士固然利用自己的中立地位避免了戰爭的摧殘，又通過戰爭中與交戰雙方的貿易小賺了一筆，但中立和金融卻並沒有直接導致瑞士的繁榮。發達的銀行業被視為是瑞士重要的標誌之一，大家甚至普遍認為瑞士在戰後的飛黃騰達、一躍成為最富有的國家之一，正是二戰賺取德國人黃金、侵吞猶太人資產的結果，實則不然。瑞士的自然資源極度貧乏，雖阿爾卑斯山可以發展觀光，卻少有耕地，更沒有什麼礦產，瑞士的富強依靠的是人力資源[72]。

[71] 王思為，〈瑞士成為永久中立國之國際背景〉，《臺灣國際法季刊》，第 10 期，民國 102 年 3 月，頁 53-67。

[72] 王世榕，《直言－駐瑞士六年實錄》（臺北市：玉山出版社，2009 年），頁 130-146。

二、瑞士特殊之共和思維

二次世界大戰後，丘吉爾在瑞士蘇黎世發表了建立「歐洲共和國」的演講，但瑞士人卻拒絕加入歐盟；瑞士的日內瓦矗立著一座聯合國的總部，瑞士人卻在1986年公投反對加入聯合國，瑞士直到2002年才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簡直不可思議。直接民主是瑞士人國民身份認同重要的組成部分，他們享受自由表達的權利，哪怕對這個問題可能真的不懂。瑞士人很愛瑞士，卻沒有豪邁的民族自豪感，但無論如何又都不能說瑞士人不愛國，相反，他們的國家自豪感非常強。只是，他們愛國的方法與民族國家太不一樣。

瑞士於十九世紀中葉才逐步建立並完善起來的高度發達的教育體係為瑞士的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力資源。早期的歐洲戰亂為中立的瑞士帶來了會造表的法國移民、會算帳的義大利移民和會教書的德國移民，讓瑞士有了製造業、金融業和現代化的大學。各大榜單中，瑞士的大學常年位於非英語國家第一，瑞士學生在歐洲畢業生薪資排行榜更是名列前茅，800萬人口的小國，卻有20~28位公民獲得過諾貝爾獎。

豐富的人力資源和發達的金融業讓未經二戰砲火洗禮的歐洲窮國－瑞士，在戰後走到了今天世界領先的位置，與刻板印像不同的是，瑞士經濟最重要的引擎其實並不是金融業，而是發達的製造業。瑞士的現代製造業發端於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的水力織布機，全面發力於19世紀修通貫穿阿爾卑斯山主脈的隧道，終於在二戰後依靠自主創新趕上世界頂尖水準。奢侈品店裡的鐘錶和軍隊士兵身上的軍刀是瑞士製造業的名片，都只是冰山一角[73]。實際上，瑞士的化工、製藥、食品、醫療器械、精密儀器、軍事工業均處於全球領先位置，許多中小企業更是佔

[73] 布雷丁，《創新的國度：瑞士製造背後的成功基因》（臺北市：中信出版社，2014 年），頁341-352。

據著同行業絕對頂尖的位置。瑞士經濟的基礎在於可以完成高難度工作的高級熟練勞動力，主要發展領域集中在微技術、高科技、生物技術和製藥以及銀行和保險業的專門技術，服務業的就業人數最多。然而，在瑞士工作的大部分人都在中小型企業工作，這些企業在瑞士經濟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三、著名之「瑞士」國際形象

在全球化和科技發達的時代，藉由新聞媒體或個人經驗，是否對特定國家印象特別深刻，或者特別有好感人們彈指之間，便能即時接收來自世界各地的訊息，由美國南加大公眾外交中心 (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 USC) 和英國波特蘭公關公司 (Portland Communications) 於2017年合作的全球各國「軟實力」(Soft Power 30) 調查報告，瑞士顯然是世界上最受尊敬和最受歡迎的小國家[74]。揆其原因，瑞士以堅定的中立態度和嚴格的治理結構，向我們展示瞭如何將經濟力量與政治穩定性相結合，以確保世界級的聲譽。作為眾多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的聚集地，瑞士脫穎而出，成為全球穩定和安全的燈塔；當世界進入未知的政治領域時，國家質量尤其重要。另一方面，穩定的國家治理是瑞士最大的優勢，但同樣在國內而能在全球舞台上被視為瑞士軟實力的是，令人驚嘆的風景、激動人心的探險旅遊和世界知名大學，這些有助於成為瑞士除了中立以外的軟實力。

美國華盛頓特區之非營利研究機構「全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機構」（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GEDI），自2011年開始發表全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指數（Global Entrepreneurship Index, GEI），用以進行全球創業發展評比。評比項目包括「創業態度」（Entrepreneurial Attitudes, ATT）、「創業能力」（Entrepreneurial Ability, ABT），以及「創業企圖心」（Entrepreneurial

[74] USC 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 The Soft Power Overall Ranking 2017", *THE SOFT POWER 30*, July 18,2017. At https://softpower30.com/ (Accessed 2018/4/3)

Aspirations ,ASP）三大面向（Sub-index），共14個評比項目（Pillars）。每個評比項目依據個人屬性變項（Individual variables）及制度屬性變項（Institutional variables） 兩類交叉處理得出數值，再將三大面向歸屬項目數值加權平均後，求得各國GEI數值，進行全球排名[75]。瑞士的政治制度擁有強大的直接民主元素，鑑於該國多語種，多種族，多教派的社會，這是一項特別令人印象深刻的範例。通過積極地將公民置於治理的核心，瑞士鼓勵公民參與，並證明增加直接民主不會妨礙有效的治理，而瑞士能獲得全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指數的第二名也不足為奇（如表4-1）。但瑞士的出色生活水平，國內政治穩定和經濟實力對公民和遊客都是不菲的代價，國際遊客的成本很高，而蘇黎世和日內瓦則定期進入世界五大最昂貴的城市。

表 4 - 1 近兩年主要國家全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指數（GEI）分數與排名

國家	2018		2017		17-18
	GEI 分數	GEI 排名	GEI 分數	GEI 排名	GEI 排名變化
美國	83.6	1	83.4	1	0
瑞士	80.5	2	78.0	2	0
加拿大	79.3	3	75.6	3	0
英國	77.8	4	71.3	8	+4
澳洲	75.5	5	72.5	7	+2
丹麥	74.3	6	74.1	5	-1
冰島	74.2	7	73.5	6	-1
愛爾蘭	73.7	8	71.0	9	+1
芬蘭	67.9	12	66.9	11	-1
香港	67.4	13	46.4	32	+19
台灣	59.5	18	60.7	16	-2
南韓	54.2	24	50.5	27	+3
新加坡	52.7	27	52.2	24	-3
日本	51.5	28	51.7	25	-3
中國	41.1	43	36.3	48	+5

資料來源：王皓怡，《2018年全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指數排名分析》（臺北市：國研院科研中心，2017年），頁3。

[75] 王皓怡，《2018年全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指數排名分析》（臺北市：國研院科研中心，2017年），頁 1-2。

其實，現在有許多國家的政府竭盡所能地，希望外國人對他們留下既深刻又良好的印象，越來越在意「外國人怎麼看待自己的國家」。這或許也解釋了，為何好幾個在臺灣的外國辦事處，例如：比利時臺灣辦事處、德國經濟辦事處，紛紛設立中文臉書粉絲專頁，和臺灣民眾互動。國家就像一個品牌，不論是為了促進外交、發展觀光、吸引人才、增加投資，或純粹提昇世人對國家的熟悉度與好感度，政府單位也需要花費大量的心力和金錢「做行銷」，宣揚國家正面的形象。

就瑞士而言，於 1976 年成立海外瑞士協調委員會，透過政府預算，支持海外宣傳瑞士的活動。2000 年，聯邦國會甚至決定將它改組為「瑞士國家形象委員會」，做為負責行銷國家形象的專門機構。除了世界展覽會，瑞士國家形象委員會也把握機會，在全球聚焦的奧運城市，籌辦瑞士館推銷瑞士。例如：在 2016 年的里約熱內盧夏季奧運會，委員會就打造了一個包含三棟建築與一個公園，總面積共 4.1萬平方公里的「瑞士之屋」讓群集里約的各國訪客[76]，可以在此做運動、品嚐瑞士美食、認識瑞士科技和旅遊景點等，加深對阿爾卑斯山小國的印象。瑞士國家形象委員會為了加強國家訊息的傳播，與不少機構進行密切的合作，例如：瑞士旅遊局、瑞士文化基金會、瑞士商業發展辦公室（OSEC）、瑞士資訊、瑞士大使館及領事館等等，更重要的是，各大民間組織，包括瑞士學校和瑞士各大知名銀行、企業等等，也經常協助參與或贊助活動。瑞士政府也刻意把國家形象與紅底白十字旗做結合，讓它成為一種真正的「瑞士品牌」。每一季，委員會還會分析和評估外媒發佈瑞士相關新聞的「正負評比」，如此一來，小國得以在經濟、文化、教育或旅遊等多個方面，積極宣傳國家形象。

[76] Swissando, ” House Of Switzerland Brazil 2016”, *PRESENCE SWITZERLAND*, 2016. At http://swissando.com.br/en (Accessed 2018/4/3)

四、包容且多元之瑞士社會

雖然瑞士面積只有 4.1 萬平方公里，人口僅 840 萬人，屬於小型國家，不過它在外媒的曝光度卻相對地高，而形象也大都很正面。瑞士聯邦外交部秘書長巴薩瑞提（Roberto Balzaretti）曾經說過，在現今資訊全球化的社會裡，國家必須在公眾之間維護外交利益，並於世界各地發揮偌大的影響力。這也是為什麼瑞士要推廣國家正面的形象和提高知名度，讓本國人與外國人知曉國家在重大議題的立場，國際認可其成就，皆符合國家利益。在商界，一個品牌再好也需要行銷，才能讓更多消費者看見它的特色與優點，興起購買的欲望。在國家品牌指數上，這個阿爾卑斯山小國的表現也很亮眼。根據 FutureBrand 發表的國家品牌指數報告，瑞士便分別於2012-2013年和2014-2015年排名第一位和第二位，而世人對它的印象有：美麗、安全、乾淨、先進、效率、教育、組織力強、高品質生活、富強、科技和手錶等[77]。因為成功的宣傳，人們不再只把瑞士與阿爾卑斯山、牛、巧克力和起司等做連結，而是聯想到小國的文化、意識型態與價值觀等正面形象。

瑞士政府則把國家當作品牌經營，竭力提升它在世界的能見度，讓更多世人認識它的正面價值，進而購買瑞士產品，甚至前往瑞士旅遊。當然，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國家。《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數據記者麥克菲利普斯（Deidre McPhillips）指，憑藉被全球看好的社會制度、商業友好和保護人權方面獲得的高分，瑞士擊敗了2016年排名第一的德國，摘得2017年最佳國家桂冠[78]，但小國也得面對大大小小的外交和內政問題，甚至仍背負著「避稅天堂」等臭名。不過就整體而言，它在國際間仍擁有相對正面的形象。

---

[77] The Creative Future Company, “Country Brand Index 2014-15”, *FutureBrand*, 2015. At http://www.futurebrand.com/uploads/CBI2014-5.pdf (Accessed 2018/4/3)

[78] 季薇，〈2017 全球最佳國家〉，《大紀元》，民國 106 年 03 月 08 日。參見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3/7/n8884943.htm，瀏覽日期：民國 107 年 04 月 03 日。

提及瑞士政治，大家便會聯想到直接民主制度。阿爾卑斯山小國最早的直接民主形式可追溯至中世紀，1848年聯邦憲法更明定公民投票制度。現今境內一年舉辦好幾次全民公投。每逢公投宣傳期，在道路及車站可見各個議題正反兩方的廣告看板。廣告標明顯眼的贊成或反對，並以簡潔有力的短句述說理由。至於報紙廣告和信箱的宣傳單，上面通常會提供數據資料，並告知選民議案通過或未通過可能衍生的結果，電視辯論更是正反兩方公開闡明意見的重要活動。

各個邦州有其獨特的文化與觀點，而大體來說，德語區（63.5%）、法語區（22.5%）和義大利語區（6.6%）更呈現了三種不同的人格特性（如圖4-1），例如：德語區人格性質較拘謹，政治立場相對保守；法語區人天性浪漫，懂得如何品味生活，是大多數自由主義的支持者；義大利語區人天性樂天，做事效率相對低，重視生活甚於效率[79]。當然，全體瑞士人不可能都抱持相同的意見，尤其，各個邦州和語區的居民對於每個議題有其立場。從此可見，瑞士人對於彼此之間的多元，以及不同觀念是相互包容，亦造就當前瑞士多元卻理性的社會。瑞士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國際地位主要因素有三：政府選擇中立的身份保證不被戰火摧殘、銀行保密法為瑞士金融業帶來大量資金、豐富的高端人力資源保證了瑞士製造的品質和瑞士金融的穩定，合理的移民政策則保證了高端人才的持續輸入，形成高薪資、高人才吸引力的良性循環。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79] 陳雅惠，《瑞士不一樣：顛覆你對最強小國的想像》（新北市：遠足文化，2017 年），頁 18-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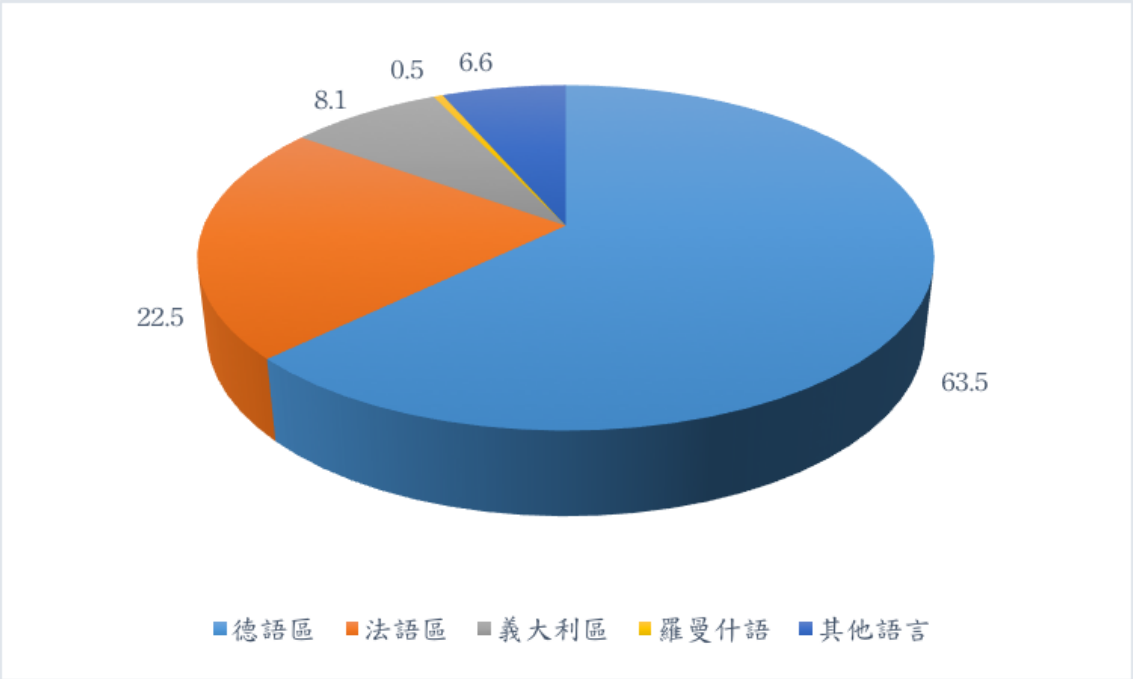

圖 4 - 1 瑞士語區圖

資料來源：瑞士國家旅遊局，參見https://www.myswitzerland.com/zo-tw/language-distribution.html（筆者修改後自行繪製）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貳、瑞士之理性策略選擇

一、多重威脅下的理性決策

瑞士能在鄰近許多強國中，能脫穎而出，在缺乏資源及市場的情況下，清楚自己的不足，利用策略的選擇來改變原本相對弱勢的部分。外交方面，瑞士直接比鄰歐洲三大強權，德、法、義，過去還有奧匈帝國在旁。每次遇到列強交戰，瑞士就遭殃，跟臺灣處於美、中、日、韓列強間的情況，頗為類似。他們的改變現況辦法是：宣布中立，把原本列強交戰的戰略要道，變成全球貿易的關鍵通道，將以往的地理劣勢，轉為優勢[80]。自1815年維也納會議宣布永久中立，瑞士近200年未受戰火波及，使許多傳統技術跟產業根基得以完整保存，成為驅動經濟的強大動力。不過，中立不代表瑞士退出外交舞台。相反的，他們透過無數的國際交流活動，發揮影響力。經濟上，兩國同以中小企業數量居多，而且由於內需市場狹小，所以都很倚賴外貿。臺灣的中小企業數量占全國98％，瑞士數量更高，占99.6％。

然而，瑞士這裡沒有金礦銀礦、更沒有石油，任何東西都得透過自己的雙手去創造。瑞士的特色是天然環境保護得很好、文化跟語言很多元、而且自1848年後就沒有戰爭了。這種環境薰陶下，使瑞士人的工作訓練精良，做出來的物品穩定度很高，也讓他們懂得思考「利基」策略，去選擇適合發展的產品，瑞士人知道自己力量小，但總想成為最好的。就連國家最高元首待遇也沒有特別高級，因為懂的如何將資源利用在正確的事物上，例如：退休總統阿道夫．奧吉（Adolf Ogi）生活再簡樸不過，不但身旁沒有助理、隨扈或保鏢，開的也只是1500c.c.的小車，瑞士最強的競爭力是他們的國民價值觀，他們從不盲從。

瑞士另一項令全球稱羨的部分是，全球最標榜「直接民主」的國家，平均每

[80] 張維邦，《瑞士史－民主與族群政治的典範》（臺北市：三民出版社，2006 年），頁 36-48。

年舉辦四到六次公投，次數稱冠世界。募集足夠的連署數量，便可行使「複決」及「創制」的公民權，影響政府法案或重大政策。短短百餘年，瑞士從烽火連天的窮鄉僻壤，搖身一變為全球最活躍、經濟表現最耀眼、形象最優質的小國典範。這是舉國上下精心策劃、全民且通力合作的結果[81]。

瑞士知道自己的國家市場小，所以開放市場讓外資投入，不僅吸收了資金，同時也吸引人才進入，受惠於客戶保密制度，讓瑞士成為富人最信任的資金避險天堂。當地保險業有過半收入來自國外，目前全球超過1/3境外金融業務由瑞士掌控[82]。瑞士的多種族跟多語言環境，如今成為吸收人才、打造無障礙溝通環境、經營跨國事業的利器。相較鄰近其他大國，缺乏人口與自然資源，因此把重心投射在技術門檻高及高質感的精密儀器，進口一噸的貨物，出口價值能達進口的2.5倍。瑞士之所以能創造出許多令人讚嘆的產品，關鍵來自於高生產力的員工，從瑞士聯邦政府七大部會架構觀察，發現瑞士根本沒有「教育部」，教育事務分散於內政、經濟兩部會，內容包括校園管理、課程設計、招生規則等細節，均由地方政府執行[83]。瑞士人的態度很務實，教育制度也以「就業力」為主要考量，而非學歷，就教育制度而言，瑞士的義務教育只有九年，國中畢業後，超過2/3的學生選擇職業教育，這與臺灣幾乎人人上大學的景象截然不同。政府的主要目標是讓95％的高中學歷青年，都有就業能力。讓學校與就業接軌，畢業後不會高不成、低不就，這正是低失業率的主因。瑞士採大學、技職「雙軌制」，非常具有彈性，只要經過1～2年的銜接教育，便可隨時轉換跑道、重讀，不怕一次決定毀掉一生。在這樣重技術人員，且政府教育計畫推展下，讓瑞士擁有高所得、穩定

[81] Diccon Bewes 著，施昀佑譯，《瑞士做到的事》（臺北市：大家出版社，2015 年），頁 130-146。

[82] 馬丁，〈試論瑞士經濟發展模式〉，《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5 期，1994 年，頁 92-98。

[83] 吳全全，〈德國、瑞士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特色與啟示〉，《國外職業教育》，第 4 期，2011 年，頁 15-16。

經濟成長的社會環境[84]。

瑞士缺乏足夠內需市場的企業，很早便向外拓展、開拓新市場，讓瑞士製造風行全球。雖然勇於拓展國外市場，但瑞士企業又極度強調在地生產，不但不使「Made in Swiss」的招牌蒙塵，甚至強打瑞士製造[85]。不管做手錶、巧克力、背包、還是大型機械的廠商，無論規模多大、歷史多長，幾乎全都留在瑞士生產。瑞士政府清楚國內沒有內耗的本錢，所以徹底奉行「小政府」主義，用人民的共識來驅動國家。瑞士聯邦政府的編制只有3萬人，教育、財稅、治安等權力通通下放地方。中央政府只做兩件事：行政效率、基礎建設。多年來，政府只出手幫過兩家企業，一是著名的瑞士銀行（UBS），另一則是官股最多的瑞航（Swiss Air）。近年瑞士成為全球資金逃難處，使瑞郎飆漲，危及出口業，才迫使央行訂出1歐元兌1.2瑞郎的匯率下限。這些都是特例，因為瑞士人民認為政府還是不該干預市場的。瑞士企業很少跟政府要資金，因為清楚知道要不到，也認為政府不可能比企業自己做得更好。和諧的勞資關係就是這樣來的，20世紀經濟大恐慌時期，促使瑞士勞工與雇主坐下來，並在1937年簽下和平協議，形成雙方的默契，迥異於他國勞資單位多是對立的交戰局面，這便是瑞士很少罷工的原因，何況很多爭端早在平日討論中化解了[86]。憂患意識驅動瑞士不斷向上，由於種族、語言、宗教多元，因此瑞士人長年來被訓練出善於傾聽、溝通的本領，永遠都要尋找折衷的辦法。

瑞士公司還會提供員工深入當地文化的課程，協助員工融入各城邦。而成長的責任，就落在員工身上，公司的任務，就是提供最好的環境。瑞士的社會是由

---

[84] 姜大源，〈高等職業教育：來自瑞士的創新與啟示〉，《中國職業技術教育》，第 4 期，2011 年，頁 27-42。

[85] 磯山友幸，《瑞士品牌攻勢》（臺北市：小知堂，2006 年），頁 86-95。

[86] 高宜凡，〈瑞士是故意的〉，《遠見雜誌》，民國 102 年 02 月 27 日。參見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17744，瀏覽日期：民國 107 年 04 月 09 日。

下往上、由人民驅動的，再者，瑞士的多語言環境與教育系統，方便吸引各國人才，他們在瑞士可以互相對話、繼而激盪出新的創意。

二、瑞士務實態度之展現

瑞士的成功來自於瑞士支持國家雙重教育體系的務實經驗，使瑞士人能夠透過直接民主來確定自己國家的未來，保持歐洲局勢的影響力，並有助於避免常常伴隨成功的自滿情緒，維持理性的公民良好制度[87]。擁有830萬人口的國內市場，顯然能看出高價值出口是瑞士成功的主要推動因素，以優質、一流的基礎設施和強大的創新為國家品牌的支撐。瑞士的政治制度是非常分散的，有26個州且聯邦州各設置自己的關稅，經營各自的大學，並為自己的醫療保健、福利、執法機關和公共教育提供資金。但彼此之間卻能夠替總體瑞士國家利益著想，這也是瑞士公民最理性的部分。瑞士政府將立法提交給具有約束力的公民投票，這使政府有責任確保他們與其他各方合作，真誠協商並與他們所服務的公民建立聯繫。

就瑞士的策略選擇而言，因為清楚自己國家的資源不足、市場過小，政府立憲中立制度避免淪落為週邊大國併吞的危機，且著重在提高國家素養最基本的因素－教育，從國家組成最基本的公民開始培養，型朔出瑞士人重實務、理性、尊重多元的個性，瑞士社會營造出熱愛工作的「工匠精神」，主要是瑞士人態度相當務實，教育制度也以輔助就業為主，而非高學歷，而這樣的公民個性是其他國家鮮少擁有的。就經濟方面而言，開放外資進入，且設下嚴格的保密規定，並且打造出高品質的服務，吸引更多的資金，替國家金融打下紮實的經濟基礎；就產業部分，因為缺乏資源、生產力也相較不足，因此把重心放在高品質、高技術的產品，產品數量雖然不多，但卻有高品質的保證，利用最小人力成本，達成最高

[87] 蕭富元，〈瑞士把矛盾，融成天堂〉，《天下雜誌》，民國 105 年 06 月 21 日。參見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7018，瀏覽日期：民國 107 年 04 月 09 日。

利益；不僅如此，瑞士人知道好的商品都需要建立品牌，強打瑞士製造的品質保證，讓國際上將高品質與瑞士製造劃上等號。

整體來說，瑞士在多重不利於國家的因素下，選擇了「避險」的策略，瑞士在中立制度的基礎下，利用了巧實力策略，讓國家從原本不起眼的歐洲小國，成為國際間相繼效仿的典範。一方面利用軟實力來吸引國外高等人才進入，另一方面瑞士的國家硬實力也不容小覷，除了本身瑞士人驍勇善戰的傭兵精神，在國防方面，因為國家小，採取全民皆兵政策，做國家人力資源做最好的利用，並且在國防上加入精密儀器的結合，不因為國家小而讓國防力量弱化，同時也能嚇阻其他國家想要入侵的意圖。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第二節　兩岸不對稱形勢下之我國安全困境策略選擇

壹、不對稱形勢下之我國外交困境

前行政院長郝柏村曾說，臺灣前途從來不是臺灣人民自己決定，聽起來雖刺耳，卻是國際競逐下赤裸裸的真相，無論誰做臺灣的領導人，都不可能不理美國、大陸兩大強權的態度。或者更精確地說，臺灣當然可以決定自己怎麼做，但卻無法決定別人怎麼回應，若完全不理別人的態度而行，後果恐將難以設想，因為國際社會一切仍是以實力做決定[88]。

針對今天臺灣與美國之間藕斷絲連的關係，正源自戰後的歷史，和平光景沒有多久，大陸便陷入國共內戰，而後國民政府撤退來臺，美國採觀望態度，宣稱一切要等「塵埃落定」；直至韓戰爆發，才使美國察覺必須在西太平洋建起反共防線，並決定協防臺灣，稍早還是敵人的日本，也因此搖身一變，成了美國在東亞最重要的盟國。後因國際局勢的改變，美國決定協防臺灣；同樣源自國際局勢的又一驟變，1978年美國轉而承認中共；令人諷刺的是，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主因是要聯合中共對抗蘇聯；而中、蘇共關係發生嫌隙的資訊，竟又是來自臺灣派到大陸進行情蒐的空軍黑貓中隊。從中得知，國際現實政治舞台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國際現實的殘酷，各國皆以追求最高利益為目標。

一、陳水扁時期之外交困境

在陳水扁執政的八年，對內積極推動去中國化政策，對外烽火外交的理念思路欲繞過中國大陸，吸引美日國際勢力以突破外交孤立，朝向獨立建國方向前進，在國際社會中試驗著推進獨立之路。結果臺灣整體發展遲滯不前，落居亞洲四小龍的最後一名，這是民進黨第一次透過執政的機會驗證四不一沒有的可能性

[88] 楊毅、陳芃，〈郝伯村：台灣前途由全體中國人決定〉，《中國時報》，民國103年9月4日。參見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904000373-260102，瀏覽日期：民國 107 年 03 月 27 日。

與國際社會的接受度，然而，得到的結果不盡理想[89]。

二、馬英九時期之外交困境

反觀馬英九執政時期，確實為兩岸關係奠立劃時代的貢獻，對於大陸採完全開放的全面交流[90]，受到大陸強勢崛起牽動的影響，在兩岸頻繁交流溝通下，政府卻無法在兩岸大交流中，立定清楚戰略目標與步驟，引領兩岸關係穩定發展，朝向持續推動國家發展步伐，做好國家安全管理，並減低臺灣社會受到大陸政治、經濟、社會全面性的衝擊。導致於在兩岸大交流下，臺灣社會對大陸所產生的矛盾與疑慮心結加深，對於沒有方向、欠缺戰略規劃的政府，逐漸累積成不滿與擔憂，欠缺扎實的未來發展戰略，反而對於年輕的世代失去吸引力[91]。

三、蔡英文時期之外交困境

2016年12月聖多美普林西比與中華民國斷交後[92]，接續2017年6月間巴拿馬宣布與我斷交，然而巴拿馬的斷交卻更直接觸動臺灣生存危機的敏感神經，兩國皆接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正式宣告兩岸再度返回對抗時期。兩岸關係逐漸惡化後，斷交的效應不斷衝擊臺灣內部政治意識，激化朝野的矛盾性，這些都清楚驗證政府迴避兩岸關係，無法應對兩岸關係變化中的微妙性，且讓我國的外交困境更加惡化。

蔡英文總統執政以來，兩岸關係緊張的氛圍漸漸升高，從原本停滯的冷和平，逐漸轉變成冷對抗，臺灣內部的矛盾更為激化。蔡政府在臺灣內部積極的去中國化作為，以及對兩岸關係採取敵視導向，北京對蔡政府的耐心已經耗盡，兩岸正式進入冷對抗。北京也開始封鎖臺灣的對外活動空間以及回應臺灣當前邦交

---

[89] 林克，〈迎戰「烽火外交」，北京外弛內張－中共圍堵台灣手段將更加強硬〉，《商業週刊》，第 771 期，民國 91 年 9 月 2 日，頁 64。
[90] 蘇起、童振源主編，《兩岸關係的機遇與挑戰》（臺北市：五南出版社，2013 年），頁 7-18。
[91] 王曉波，《中國崛起與馬英九的困局》（臺北市：海峽學術，2014 年），頁 188-189。
[92] 劉曉鵬，〈省思聖多美普林西比斷交與奈及利亞遷館〉，《戰略安全研析》，第 141 期，民國 106 年 1 月，頁 27-34。

國意欲與中國大陸建交的要求，兩岸關係的外交休兵正式劃下句點[93]，故於2018年5月1日多明尼加斷交與我國正式宣布斷交。

四、國際現實主義的反撲

臺灣政黨輪替結果產生了爭奪眼前政治利益，欠缺對國家長遠的規劃與發展視野，更缺乏對政策延續性的容忍與認知，尤其是對中國大陸的政策。面對中國大陸崛起，周邊國家皆已採取相對應政策以為因應，但是此時我國正值民主政治進一步深化的過程，挑戰脫離大陸單一的國家認同，直接衝擊內部穩定以及兩岸關係的持恆。國民黨近年來一直靠著「九二共識」為基礎推進兩岸關係[94]，對於下一步如何與大陸進行深度合作分寸拿捏，卻無縝密的規劃與政治準備，自國民黨2008年重新執政以來，兩岸政治上往來，是每當臺灣提出「一中各表、九二共識」時，中共就以「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來回應。這種互動模式儼然成為一種「沒有共識的共識」；而民進黨一直籠罩在臺獨路線的驅策下，眼前緩和兩岸關係的任何說法都偏重發展壯大臺灣自主路線的作法，「一邊一國」說法從陳水扁時代到現在，民進黨政策並無清楚應對的替代方案[95]。正當全球整個外在政經環境都在進行劇烈變化之時，加上中國大陸強勢崛起，在國際社會上更具有舉足輕重影響力，對臺灣產業的吸引力、經濟發展之依賴度更甚於過往。時空環境變化，蔡政府執政以來，兩岸關係陷入冷對抗的緊張中，原先的良好關係，希望在維繫共同政治基礎上，維持住兩岸的交流與互動已不復見。政府持續展開對北京爭取獨立的做法，直接挑動兩岸敏感神經。民進黨經由第二次執政良機想再次柔

[93] 王高成，《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形勢與挑戰》（臺北市：時英出版社，2017年），頁117-123。

[94] 童振源，《台灣未來關鍵下一步：透視2016選前兩岸關係發展與政策》（新北市：博誌文化，2014年），頁13-15。

[95] 林國棟，〈「一邊一國」論述模式的起源與轉折〉，《黃埔學報》，第44期，民國92年3月，頁77-97。

性推動臺獨、深化連結美日的可行性[96]，然因為無法與北京取得默契，兩岸原先已建構的所有官方接觸管道都告中斷，導致兩岸關係陷入困境，從經濟、文化、觀光旅遊的緊縮，嚴重衝擊我國的經濟處境，亦使我國在外交上更加艱困。

面對接連斷交的困境、兩岸官方交流的中斷、國際空間的緊縮，政府具體限制大陸人士來臺，雖然提出新南向政策如火如荼推動[97]，但已引起周邊相關國家有牽涉對抗中國大陸的疑慮，政策效果不如預期可想而知。特別在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的全球戰略影響下，新南向政策具體效應上將受到重大影響。在中斷兩岸直接接觸後[98]，已無法直接掌握住當前的重大發展趨勢：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國大陸發展態勢、川普和習近平正在形成中的政策合作又競爭新模式導向。而因為隔離兩岸政策使然，徒增兩岸政府間的敵對意識，進一步讓臺灣陷入對外政策更艱困的瓶頸。

2014年太陽花學運，反中運動製造出新世代民粹意識瀰漫整個臺灣，讓工商界憂心忡忡，反中政治運動挑動兩岸的固定慣性，只有抗爭沒有具體建設之思；有充斥激情欠缺務實作為，卻嚴重影響臺灣未來的機會[99]，連結兩岸的任何努力都被批為「親中賣臺」，更撼動中華民國的法統依據，直接導向追求臺灣新的主體性。民進黨在當年年底的九合一選舉和2016年的總統選舉都大獲勝利，雖然民進黨在國內當時獲得了選舉的勝利，但在國際現實主義下，我國外交也遭受到更嚴重的壓迫。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96] 陳芳明，〈臺灣完成第三次政黨輪替〉，《二十一世紀》，第 154 期，民國 105 年 4 月，頁 4-12。
[97] 徐遵慈、李明勳，〈我國新南向政策的執行成果與未來展望〉，《經濟前瞻》，第 176 期，民國 107 年 3 月，頁 9-18。
[98] 劉衛東，《一帶一路戰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年），頁 14-16。
[99] 倪炎元，〈2014 年臺灣太陽花學運中的官方論述策略〉，《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42 期，民國 106 年 10 月，頁 23-57。

五、美中臺三邊關係下的臺灣處境

以美國為例，在冷戰最激烈的時代，民主、共和兩黨對蘇聯等東歐政權有截然不同的政策，但美國每次與蘇聯展開重大談判前，有關戰略武器談判還是涉及外交衝突，不論誰執政，一定先跟國會在野黨領袖會談[100]。國內先有一定共識基礎，對外談判才有更多的策略手段。不論選舉時競爭多麼激烈、各政黨的外交政策如何南轅北轍，民主先進國家在選後外交問題上各政黨必定先取得一定共識，然後對外談判時口徑需一致，日後政府輪替也不影響政策延續。只要多數臺灣人民理解「國家命運高於政黨利益」的意義，就會形成國、民兩黨必須合作一致對外的共識；只要人民具有國、民兩黨必須要有共識的共識，國、民兩黨一定會談出共識，這才是實質的「臺灣共識」[101]。

今天臺灣的國家安全除了應積極建構完整的安全體系之外，所應仰賴的應該是智慧的兩岸政策與彈性的對外關係。臺灣現在和未來的國際人格、國際處境、國際參與，都與中國大陸脫離不了關係；由於國際社會普遍存有一個中國的認知，在此國際政治現實中，對於臺灣的特殊國際地位和未來國際空間發展的可能空間，都將可能取決於中國大陸的態度與兩岸關係的政治因素。因此，從爭取進入聯合國到參與其他國際組織活動，我國政府應更加深思熟慮。

2018年1月9日美國眾議院經過一年多的遊說努力，無異議通過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臺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 HR535）。此法案的關鍵內容包括：允許所有階層的美國官員到臺灣旅行，並與臺灣對口的官員會晤；允許臺灣高階官員在「受尊重的情況下」入境美國，並和包括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等官員會晤；鼓勵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及其他臺灣在美國設立的功能性機構在美國拓展

[100] 紀舜傑，〈美國政黨競爭與外交決策之互動研究〉，《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期，民國94年，頁103-118。

[101] 龐解，〈「台灣共識」與2012年總統大選〉，《中山學報》，第32期，民國101年8月，頁1-10。

相關業務。

表面上，臺旅法是繼「臺灣關係法」之後對我國最有利的一項美國國內法，不僅打破1979年臺灣關係法對臺美斷交後雙方官員互訪的無形限制[102]，也衝倒1994年國務院「美國對臺政策調整」不准臺灣正副總統、正副閣揆和外長、防長訪問華府的有形限制。臺旅法只是讓臺美官員互訪從妾身未明的狀態變成於法有據，但官員互訪層級、時機及場合仍由川普說了算，而讓臺旅法成為行政部門制約中共的一項外交工具。因此北京認為，蔡政府既然不願接受九二共識，更不可能提出「一中原則」的表述，大陸也就毫不留情地對臺外交打壓、機艦繞臺、封鎖「新南向政策」、祭出31條對臺措施，推動外交困臺、軍事嚇臺、經濟窮臺、文教笨臺的政策[103]。

臺灣目前處於美、中兩強之間，面對美國國會通過此法，仍須謹慎以對。固然這是對我國善意之表現，是一項正面發展，但也不能一廂情願。原因首先是，「臺旅法」開宗名義指出，臺灣的國家安全與穩定為美國政治、經濟與安全上之重大利益。此法表面上推崇臺灣的重要性，但在國際現實的框架下，美國亞太戰略布局中仍以美國利益為上。該法給予了美國行政部門制衡中國大陸的籌碼，但臺灣就淪為川普面對中國大陸的籌碼。

再者，美國貿易代表署甫公布的年度貿易政策議程報告書中，再度點名美豬、美牛等議題為臺美貿易重要關切事項，日後美國是否會藉由臺旅法施壓臺灣，要求美豬、美牛開放進口，相關部門應提早研議因應；另川普上台後，經濟利益為其重要施政目標，以掃除與各國貿易障礙為重點，川普將對鋼鐵與鋁進口製品分別課徵25％與10％的懲罰性關稅，可能引起一場全球貿易大戰，我國恐也

[102] 許忠信，〈台灣關係法與台灣經濟安全〉，《台灣國際法季刊》，第 11 期，民國 103 年 12 月，頁 15-32。

[103] 陳一新，〈美國會頻通過友台法案與川普的盤算〉，《中國評論》，第 243 期，民國 107 年 3 月，頁 22-25。

無法置身事外。如今美國國會通過臺旅法無異替川普的亞太戰略再添柴火，況且美國已將中國大陸定調為「戰略競爭者」，圍堵中國大陸的戰略輪廓已大致成形。相對地，北京對此反應強烈，中共外交部表示嚴重違反「一中原則」，國臺辦更警告臺灣「勿挾洋自重，否則只會引火燒身」，後續陸方是否會有反制動作值得觀察。現在正值兩岸關係冰凍、中美貿易大戰一觸即發之際，對於臺旅法，政府不必太興奮，需謹慎提防臺灣成為川普政府對中的籌碼[104]。對於大陸於2018年2月28日送出「31項對臺政策」之後，美國國會也相繼送給臺灣「臺旅法」的好禮，這兩項對臺的禮物表面上均是利多，實質上卻隱含著衝擊，對我國而言極有可能衝擊我國的國家安全。

貳、我國之安全困境策略選擇

一、國際現實主義下的因應作為

綜觀全球局勢，我國在全球的地位實具有特殊性。由於地理戰略位置關係影響，我國被夾在中美兩強之中，因此國家領導者在安全策略選擇上就更為重要，任何選擇則可能影響國家安全及利益。就現在執政黨而言，針對中國大陸提出「兩不變兩不會」，採取「善意不變、誠意不變、不走回敵對的老路，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的兩岸政策，並以維持兩岸和平穩定的基準下，相互交流；相對地，我國對於美國而言，向美國親近是比較能符合整體國家利益的選項，但就美國現職領導人川普的思維，以及以美國利益為優先的前提下，政府若採取此項選擇，極有可能淪為美國在亞太地區與中國大陸談判的籌碼，況且我國當前不論經濟、國際外交等皆與中國大陸有一定的連結，政府若採取完全親美的選擇，我國勢必在國家利益及安全上付出相當大的代價。由此析論，兩岸關係從來不是單純

[104] 江靜玲等著，〈美參院通過「台旅法」交川普簽署〉，《中國時報》，民國 107 年 3 月 2 日。參見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302000506-260119，瀏覽日期：民國 107 年 03 月 29 日。

兩岸之間的關係，美國因素一直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美中臺三邊互動才是兩岸問題的基本狀態。根據戰略三角理論，對臺灣最有利狀態是成為「樞紐」[105]。陸委會主委陳明通認為，美中臺的三角戰略關係經過多年來非合作、多層次的互動已經達到一種均衡[106]，基於此均衡之下，臺灣能得到的是不接受大陸的統治、臺灣海峽沒有戰爭；對大陸而言，能得到的則是臺灣不追求法理「臺獨」、世界各國不挑戰其一個中國的說法；對美國來說，得到的是臺灣不會變成中共的軍事基地，因而不影響其在太平洋西岸的海上運輸通道[107]。

因應中共未曾放棄武力犯臺，臺灣由此需要美國的保護，然而國家實力才是根本，國家間的利益關係不可能和諧，利己才是一國決策者的理性考量。這就是沃爾茲所提出的國際現實主義，國家利益必須主動爭取，無法依靠其他人。因此，從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學派觀點，能看清《臺灣旅行法》的意義，該學派強調強權間的關係會影響各國的命運[108]。據此，對美關係、對中共關係，臺灣都不能荒廢，再者，國家的首要目標在於生存。換言之，臺灣要生存得靠自己的實力，除了尋找盟友，也得想辦法振興自己內部的實力，據此，臺灣仍舊需要靠兩岸關係的和解來加深臺灣綜合國力，另一方面，利己也代表美國對於盟友始終有自己的盤算。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05] 顏建發，《台灣的選擇：亞太秩序與兩岸政經的新平衡》（臺北市：新銳文創，2014 年），頁 210-222。

[106] 初國華、張昌吉，〈戰略三角理論與台灣的三角政治〉，《問題與研究》，第 49 期，民國 99 年 3 月，頁 92-104。

[107] 陳明通、楊喜慧，〈兩岸政治談判協商主體與身份研究〉，《中國大陸研究》，第 58 期，民國 104 年 9 月，頁 80-95。

[108] 巨克毅，〈當前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之探討〉，《宗教哲學》，第 73 期，民國 104 年 9 月，頁 67-75。

二、我國之安全策略選擇

小國在面臨威脅時，能夠做出的策略選擇有：向外擴張勢力、抗衡、避險、扈從等。以我國目前的國際地位而言，向外擴張勢力是比較困難的選擇，無論在經濟、軍事方面，我國皆受美、中影響，尤其在中共不斷崛起的勢力下，我國要有所突破實屬困難。然而選擇抗衡，手段係屬積極面向，但相同地，選擇抗衡對於我國而言，所爭的可能是國際承認的法理性，但從過往的陳水扁政府與現在的政府做法來看，在國際社會都是在國際現實主義的框架下，不僅會造成國內民生的窘境，在國際上也無法有更多的外交機會。倘若選擇扈從，這樣的選擇是屬於比較消極的做法，順從大國的意思行動，相對同時也未採取應對的防衛措施，最後只能淪為中共、美國談判的籌碼，無法按照自己的意識在國際上生存。然而，選擇避險則是介於前兩者之間，不與中美交惡，並且多與其他國家相互交流，雖然官方之間的交流可能不多，但能透過民間團體，向外尋求國際能見度、建立新興外交關係、謀求最適立場，在經濟方面能拓展新市場，打破原有市場的中、美侷限；在軍事方面，面臨外來威脅時，我國國防力量亦能提供適度的嚇阻與抗衡。

概括言之，在我國面臨強權國家威脅及國際現實主義框架下的策略選擇上，我國倘若能選擇「避險」的策略，就是利用巧實力策略來突破國際困境，一邊利用軟實力來吸引其他國家，並對我國產生好感，達成合作目標，共創共同利益，但光靠軟實力的約束力相對弱化，因此必須靠硬實力來支撐，讓我國不至於在受外力威脅時，沒有堅強的國防後盾來支持國家安全。

第三節　我國走向東方瑞士之路的挑戰與可能性

壹、我國走向東方瑞士之路的挑戰

中國大陸經濟的崛起、企業全球化的佈局、國際經濟版圖的變動，經濟結盟的趨勢，乃至於新興市場的崛起，都使臺灣過去賴以成功的發展模式面臨挑戰。「東方瑞士」一詞，是環觀瑞士同樣在強敵環伺下，卻能夠免於侵襲，且能在國際經濟及國家安全上有一定亮眼的表現；反觀我國，近幾年在「一中原則」的困擾下，不斷在國際上失利，為了突破此僵局，因此提出我國可以向瑞士學習，成為永久中立國，讓我國能解決兩岸長期以來僵持不下的局勢，並在國際上有嶄新的一面。而成為永久中立國必須具備三項條件，第一是該國必須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第二是國內民眾需對於和平中立外交支持並認同、第三是鄰近國家與國際社會能支持「永久中立」的地位[109]。

以第一個條件來說，對於我國要成為東方瑞士就屬於極大的挑戰，以我國憲法而言，我國的確為一主權國家，但要成為永久中立國與獨立運動，兩者是有共同目標，就是建立自己的國家，但在國際現實狀況下，目前普遍國家都是堅守「一中原則」，而這個「一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中華民國。從國際現實來看，我國近18年來斷交了13個國家[110]，與我國有107年邦交的中美洲友邦－巴拿馬，於2017年06月14日與我國斷交，並且與中國大陸建交；再者，於同年5月1日，在中國大陸金錢外交的攻勢下，多明尼加中斷與我國長達77年的外交關係，並與中國大陸建交。從這點來看，國家之間的互動依然是以國際現實主義為基準。從圖4-2可以看出，多數與我國斷交的原因皆是因為中國大陸的巨額金援，導

---

[109] 陳秀麗，《永久和平中立－台灣走向東方瑞士之路》（臺北市：望春風文化，2013 年），頁 26-29。

[110] 楊之瑜，〈台灣 18 年來遭 13 國斷交，還有哪些邦交國「岌岌可危」？〉，《關鍵評論》，民國 107 年 05 月 01 日。參見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4716，瀏覽日期：民國 107 年 05 月 01 日。

致我國原本的邦交國在利益的誘惑下，轉而與中國大陸建交。明顯地，在中國大陸的打壓下，我國若要堅持在國際上正名，未來肯定會在國際上失去更多友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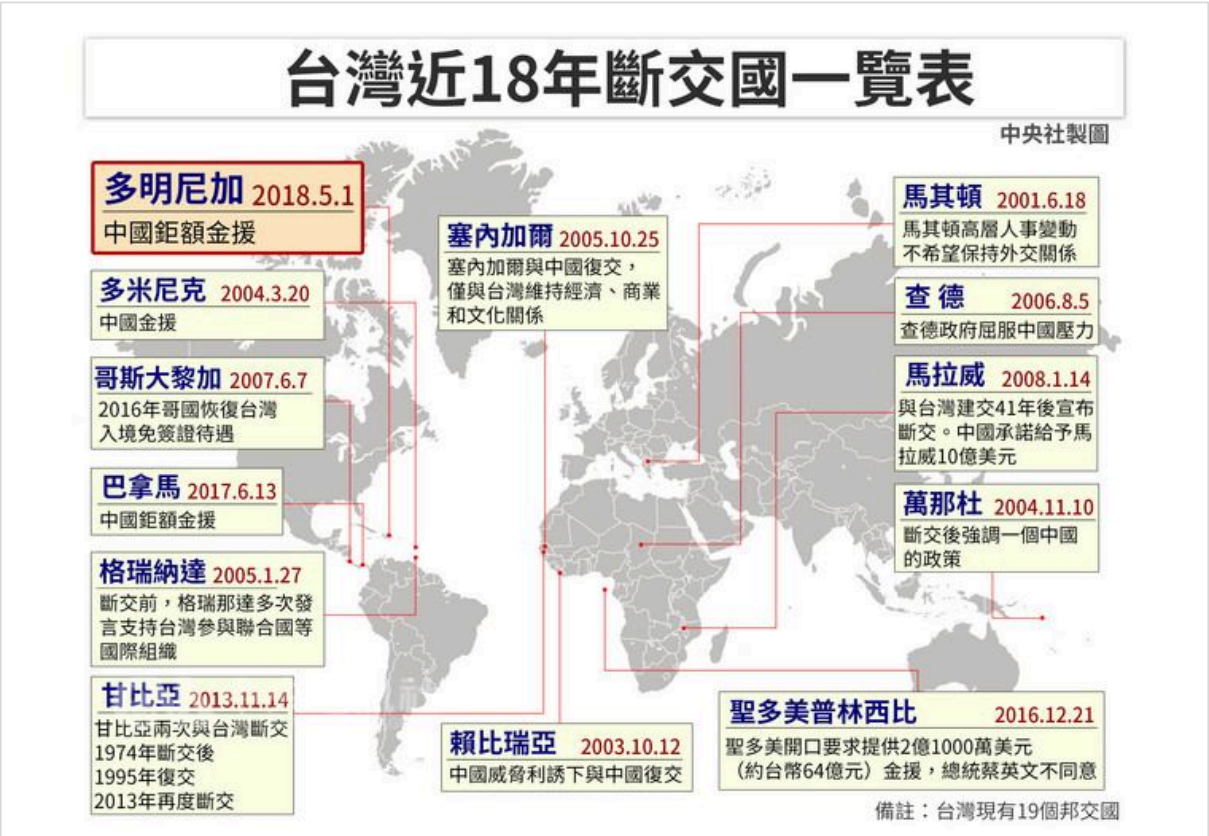

圖 4 - 2 臺灣近 18 年斷交國示意圖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參見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5010108-1.aspx

從第二項條件來看，我國國內民眾對於和平中立有一定的認同感，但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針對我國統獨議題與維持現狀的圖4-3來看，維持現狀再決定的民眾占大多數，其二是永遠保持現狀，第三則是偏向獨立，從圖能得知，我國民眾對於統獨議題，其實多數持平在維持現狀再決定，代表民眾其實一直有期待政府能夠有所突破，不過礙於國際現實，只能暫時保持現狀，再視國際狀況而定。如果和平中立能夠突破現在臺灣的困境，相信民眾肯定會全力支持政府來推行，但國際上仍有許多現實問題要克服，光就兩岸議題就是我國在國際上遲遲無法有所突破的主因。所以我國若要和平中立，是可行的選項，不過就過往的歷史經驗

來說，我國要突破現況必須付出許多代價來達到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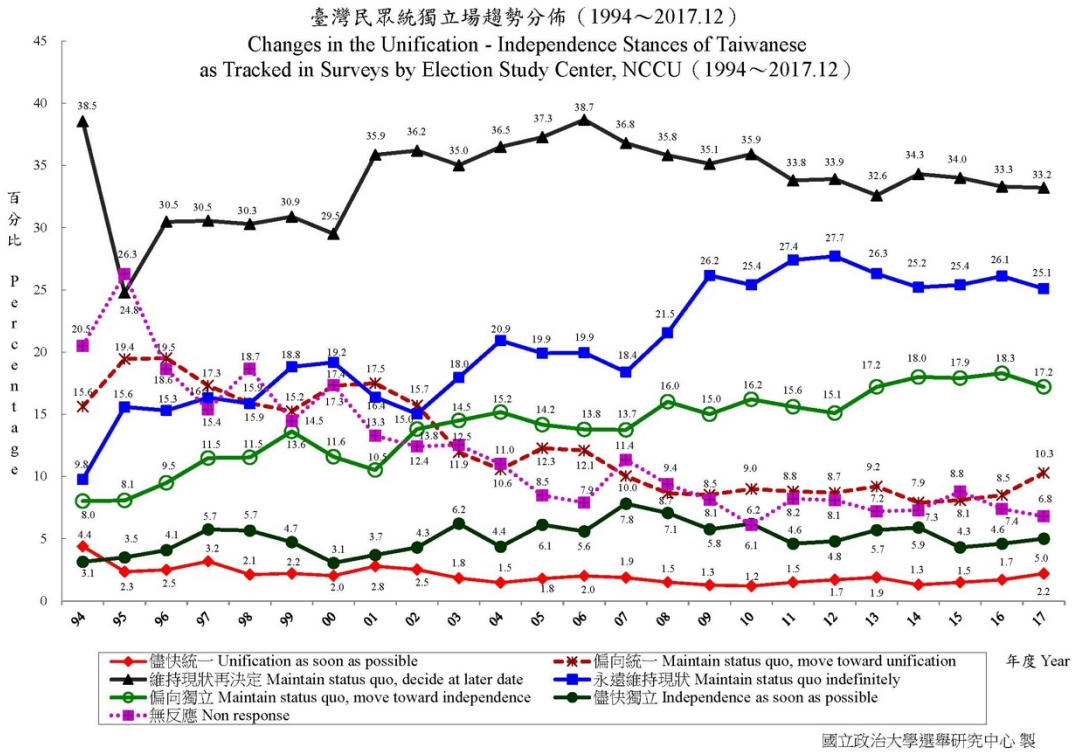

圖 4 - 3 臺灣民眾統獨立場趨勢分佈

資料來源：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參見https://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Sn=167

就第三項條件來說，鄰近國家與國際社會要能支持永久中立的地位，要鄰近國家與國際社會承認我國永久中立的地位，實屬困難；要達成永久中立國之前，國際上必須先承認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在國際現實的國際社會中，我國地位是模糊的、浮動的，少部分國家承認我國，但大多數國家皆承認中共為唯一的中國，而我國就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因此，我國要達成永久中立國實際上有許多窒礙難行的部分，東方瑞士是一種目標，但也是一種想像。或許我國無法達成東方瑞士的目標，完成永久中立國的夢想，但可以效仿瑞士其他的優點。例如：良好的教育制度、多元包容的社會環境、理性的公民素養……等等。

貳、我國走向東方瑞士之路的可能性

其實，臺灣與瑞士十分相似，同樣都是多元文化國家，瑞士東、北鄰接德國文化，西南方則身受法國文化影響，南方則是義大利文化，這讓瑞士境內充滿歐洲文化的精髓，成為多元文化的社會。反觀臺灣，歷史上曾經是荷蘭、西班牙和日本的殖民地，也有被中國大陸的帝制統治過，而在戰後也成為美國在亞洲的勢力範圍，再加上南島民族的原住民文化，這些多元的文化也造就了現在的臺灣文化。

就地理位置而言，臺灣與瑞士皆處於區域戰略要塞；瑞士北接德國、西接法國、南鄰義大利、東臨奧地利與列支敦斯登，更重要的是瑞士控制著阿爾卑斯山的重要位置，使得瑞士成為兵家所爭之地；臺灣處於亞太列島的軸心位置，正處於世界最大陸地與最大海洋之間，同時也是東北亞與東南亞的戰略樞紐，因此臺灣一直是周邊各國覬覦的對象。就民族而言，臺灣與瑞士也是由多元民族所組成的，瑞士主要是由德裔、法裔、義大利裔與少數民族所組成，多元民族之間語言相互融合；臺灣則由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加上後來的新住民，來自各方的多元民族也漸漸在臺灣和諧共處[111]。

不論從地理位置、國際戰略地位、多元民族及文化，臺灣與瑞士其實有許多相似之處，我國要成為東方瑞士是有可行性的，但這也並非唯一一條道路能突破國際困境。就國際現實而言，我國要順利成為東方瑞士是會有許多障礙的，其中最大的莫過於中國大陸的打壓，以及國際社會的不認同。如果這條路不通，可以往別的方向走。以臺灣目前所遇到的窘境，能突破的就只能靠巧實力來突破。主要是國際現實不認定我國是一個國家，但我國仍可以依靠別的方式在國際中佔有一席之地，就是必須要靠巧實力，利用軟實力來吸引其他國家的認同、利用硬實

[111] 陳熙樞，《東方瑞士・台灣》（臺北市：大村文化出版，1996 年），頁 121-127。

力來維護國家利益。

反觀我國內民眾的趨勢，從圖4-4可以得知，認同自己是臺灣人的日趨升高，而認定是中國人的已經日趨下降，而兩者皆是的則成持平狀態。時代的轉變，原本的「反攻大陸」已經成為口號，而不是目標。現在政府更應該著重在如何讓臺灣這塊土地在國際上仍維持有一定的能見度，而不是在中共的威脅下，逐漸漠落在國際的棋盤上。然而國家認同感在政府推動政策時，是一項非常有價值的參考依據，國內多數人已經視自己為臺灣人，執政者就更應該拋開過去的框架，讓自己的國家能在國際舞台上持續發光發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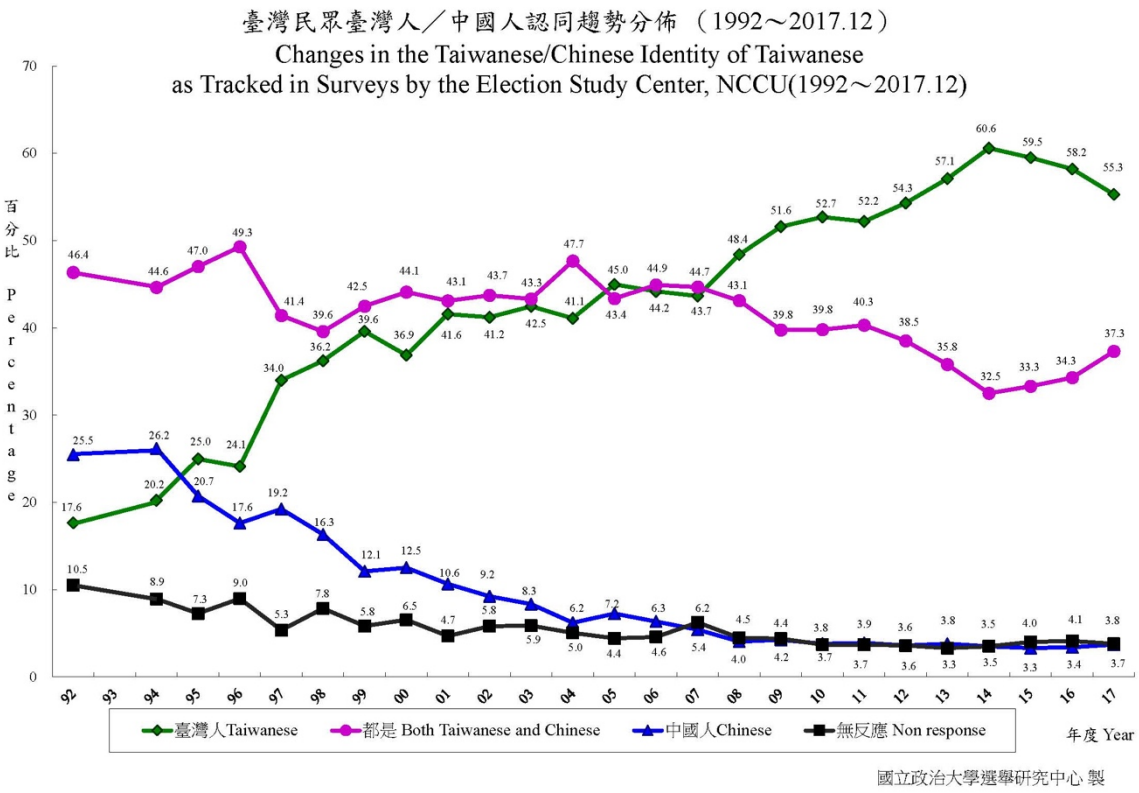

圖 4 - 4 臺灣民眾臺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圖

資料來源：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參見https://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Sn=166

另外，從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兩岸經濟統計月報中（圖4-5），可以看出在馬政府時期與大陸之間來往較為頻繁，相對來臺從事經貿或觀光活動的人數較多，自蔡政府於2016年05月20日上任後，大陸人來臺的次數相對減低，主要是因為政府的政策與中共的「一中原則」有所抵觸，不斷在軍事上、經濟上給予我國極大的壓力。要解決這樣的方法就是不與之交惡，在不危及國家安全及利益之下，我國可以向外拓展更多市場，而不是為了「正名」之戰，導致國家在外交上處處碰壁，國內民生又無法得到相對的解決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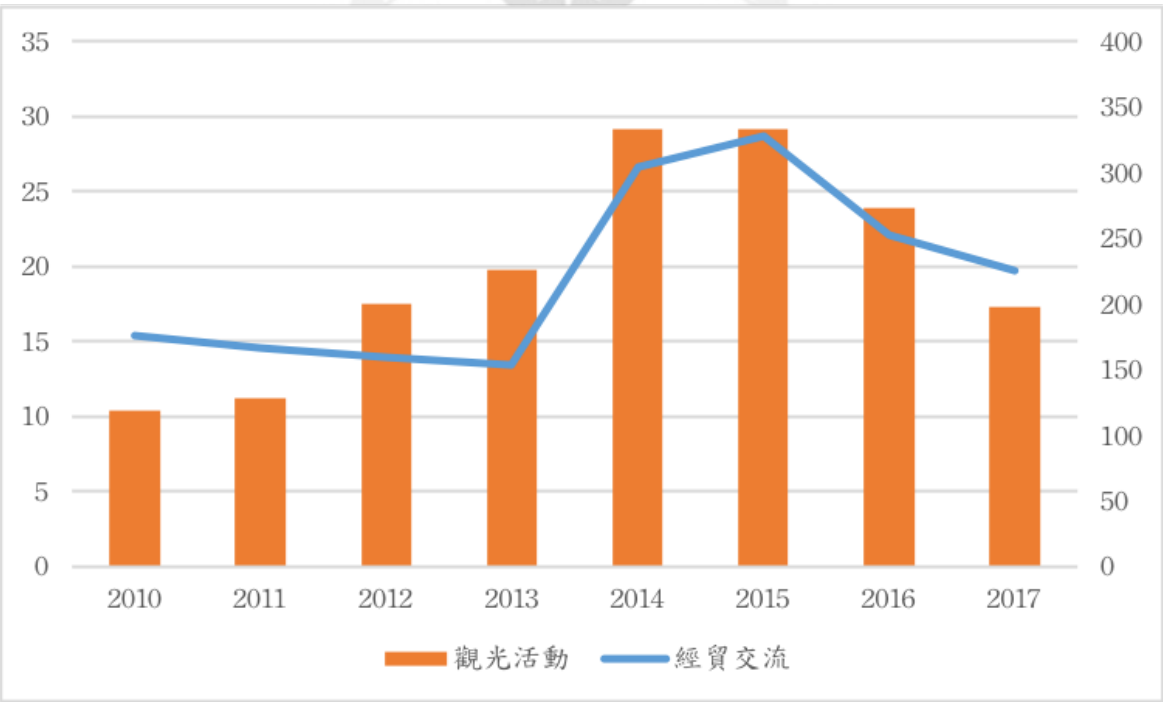

圖 4 - 5 中國大陸人民來臺人數

資料來源：臺灣經濟研究院，《兩岸經濟統計月報300期》（臺北市：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16年），頁2-18。（筆者修改後自行繪製）

提出上列圖表並非要解釋我國需要一直向中共妥協，抑或是以中共為軸心來調整國家政策，而是要從中瞭解，違背國際現實的趨勢必須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不僅國外外交被邊緣化，國內民生也會遭受影響。因此，要能解決這樣的問題，就必須利用巧實力來突破。

嚴長壽先生在《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書中提到，臺灣被迫沒有了政治舞台後，但同時也讓臺灣有更多的機會來與更多國家交朋友；他特別強調「Mindset」（觀念）的重要性，一個領導人、一個國家的思想觀念是非常重要的。他提到我國有許多精英到美國去受訓、學習，返回臺灣後將所學習的經驗帶回臺灣，但常常卻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臺灣並非大國，而是小國。當利用大國的思維來觀看臺灣，有些地方能以適用，但卻有些地方是不合適的。作為小國，應該要想像自己是瑞士，擁有四種不同族群，應當是最容易分裂的國家，但是卻最團結，瑞士人民非常了解自己之能，與自己之不能，利用自己的多元文化，轉化成瑞士的優勢，懂得評估國家的優缺點，把國家未來掌握在自己人民手上[112]。

臺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在《像海洋一樣思考》一書提到，臺灣需要的不是透過大國或強國的角度來看世界，而是從「小國」的立場出發，做一個全球堅實民主人權與自由幸福的重要夥伴[113]。臺灣過去受到大中國歷史論述的影響，常看歷史的角度就是從帝國或天朝主義來看，在這樣的框架下，我們經常忽略了小國存在本來就有其優勢，但遺憾的是我國目前普遍只認同大國的歷史，容易會讓自己染上「邊緣性格」，以為只能依附在大國身邊，爭取委屈的生存空間。從歷史上來看，小國通常是人群往來、文化交流非常頻繁多元的地方，不可能用像19世紀的強權國家一樣，用單一民族來定義國家，也不該用過往歷史的悲情，作為我國未來施政的依據。

過去的歷史教育有兩大特點，一是區別「我者」及「他者」，二則是替「他者」貼標籤，這種教育方式也是封閉的威權國家會有的一貫作風，用較刻板的角度來看待世界，我國若要與世界有更緊密的結合，就應當要開闊多元的教育來培

[112]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臺北市：天下文化，2017 年），頁 110-134。
[113] 花亦芬，《像海洋一樣思考》（臺北市：先覺出版社，2017 年），頁 241-244。

養國民有成熟的心智、獨立判斷的思考能力，懂得從多元的視野來深入了解世界上各式各樣的文化，不要用貼標籤的方式來認識世界。以此為基礎，就能培養出足夠的視野來了解國際局勢不斷的變化，讓我國尋找出最好的出路。在亞洲地區，我國民主制度的是深受肯定的，這也是我國最大的優勢，若能充分發揮這樣的優勢，精進我國的民主能力，向外輸出民主經驗，就能夠作為我國與世界交朋友最好的利基。

臺灣應該要跳脫以往的舊有思維，重新在國際上鋪好軌道，利用巧實力策略，軟硬兼施的靈活運用，利用軟實力來吸引其他國家，利用硬實力來維持國家基本的安全需求。我國所需的是政府必須清楚國家的優勢及缺點，利用優點來擴大國家效益，藉由缺點來逆轉國際局勢，而不是專注於國內政黨之間的相互內耗，以及違背國際現實的現況，導致外交的失利與國內民生的損耗。巧實力策略不僅能讓我國突破原有的僵局，對於國家永續發展的途徑也是一大助力，原因是巧實力的運用靈活，不像純硬實力的剛硬，讓人無法接受；也不像純軟實力的無約束力，不堪一擊；靈活運用雙手策略能讓國家在國際上有更多元的選擇，也不至於歸咎於歷史的束縛或單一的外交途徑。就小國的策略選擇中，巧實力策略是最為適用的，巧實力雖然是美國所提出的，但卻能適用於各個國家，對於國家政策而言，僅是兩者比重的問題，而沒有不適用的。或許東方瑞士不是個最佳選項，但我國仍能向瑞士學習；或許無法選擇永久中立，但我國能借由瑞士的成功經驗，讓我國突破國際限制的僵局。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在國際現實主義下，國家與國家之間為相互競爭且合作的，各國皆以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為最高目標，同時國際間是無政府狀態，每個國家行為體都必須主動爭取國家安全，無法單倚靠其他國家來生存。國際社會就如同人類生活的縮影，然人的本性是政治性動物，所以追求權力必然的，因此國家透過追求權力來獲取國家利益。本研究著重於小國在國際上與大國之間的互動關係，小國在面臨強權威脅下能有向外擴張、抗衡、避險、扈從等策略選擇。而其中的「避險」策略就是利用巧實力來突破困境，以軟實力來吸引盟友加入、尋求國際認同，再以硬實力為基礎，與外來威脅進行抗衡。

瑞士在資源匱乏、強國鄰立的情況下，選擇了中立國來避免戰爭的襲擾，再者，多元且理性的公民懂的如何共同維護好不容易得來的和平國度，不僅如此，在產業上也積極與國家形象進行連結，不斷創新與高品質保證成為瑞士的代名詞，這就是瑞士巧實力的展現。反觀我國，同樣在資源匱乏的情況下，利用出口產業創造出經濟奇蹟，但中國大陸的崛起，加上國際現實的壓迫，迫使我國在國際上的空間發展有限，因此我國必須利用巧實力策略來突破這樣的困境，來改變國家發展窘境，以達國家永續發展之目標。

我國在國際現實的框架下，成為「東方瑞士」有一定的困難度，且成本也極高，或許我國無法像瑞士一樣成為中立國，但能效法瑞士在國際外交上的手段，利用巧實力突破外交困境，讓我國能在國際上靈活地與其他國家競爭和合作。本研究發現如下：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壹、小國選擇「避險」策略，有助於突破多重威脅之困境

在全球權力不對等的局勢下，世界以國際現實主義為基準，小國在茫茫大海中，本來就難以生存，但小國通常能生存下來而不被併吞一定有其優勢，所以應該利用其優勢來突破困境，而小國面臨威脅時，所做出的策略選擇中，其中又以「避險」策略為最佳選擇，主因是小國既沒有成本跟其他國家為敵，也沒有意願讓國家被併吞，因此選擇了折衷的辦法。而避險的策略就是與多國為友，共同創造利益，建立多元外交關係，不與外來威脅交惡，在最低威脅下創造最大利益；當威脅提高時，小國亦會進行嚇阻或抗衡。其實這樣的策略選擇就是巧實力因應作為，利用軟實力吸引盟友，讓國家能得到更多人的認同，同時，利用硬實力來當國家利益的後盾，避免國家被併吞。

貳、國家外交必須軟硬兼施，善用巧實力策略

孫子兵法《軍形篇》曰：「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軟硬兼施的策略是用感召啟發、誘導激勵，進行彈性勸導，即是柔性管理；用制度約束、紀律監督、強制執行，即是硬性管理。兩者相互區別、卻又相互影響，想輔相成[114]。巧實力策略就是以軟硬兼施來行使的，對於國家利益有相當大的幫助與保障，一方面吸引盟友，建立認同關係；另一方面硬實力也給予國家相當大的保障。就我國而言，在國際現實主義下，外交經常受中共打壓，必須利用巧實力策略對於國家政策發展的影響，不與其他國家交惡，從中獲取最大國家利益，國家不僅能在外交方面能得以拓展，與各國皆能維持良好關係，國家與國家之間也能因為國防武力的維持，相互制衡。

[114] 王建東，《孫子兵法大全》（臺北市：華威文化，2016 年），頁 130-135。

第二節　研究建議

壹、拋開過往歷史框架，從基礎價值觀改變

民主政治與公民社會較成熟的國家，越來越將歷史教科書所涵蓋的內容，往多元民主、公平正義、人權主義等普世價值來推進。為了確實將這些價值落實在歷史教育中，國家勢必得要面對自己的過去，然而政府不應該迴避這些過往，反而應該要勇敢面對一切，而非一昧的「去中國化」。深受中國歷史文化影響，我國的教育以往都是以大國來看待，但就現實而言，臺灣屬於小國，就歷史的演變，我國的國際地位逐漸變得模糊，「正名」之戰也未曾停歇，不斷的爭鬥，只會讓國家內部及外部有更多的猜忌及不安。現在的我們應該拋開過往的歷史框架，並不是要放棄過往歷史，而是要記取歷史的教訓，提高國民國家認同感，改變固有的框架，創造新的局勢。

我國《憲法》第十三章第五節第158條中提到：「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健全體格、科學及生活智能。」，從此可知，教育是國家實力的根本，更加重要的是國民價值觀，必須從新的角度來解決問題。國家的基礎教育若能改變，撇開過往歷史的羈絆，從新的角度來出發，相信我國未來一定會有不一樣的面貌。

貳、培養理性公民與包容多元文化

和諧的社會是必須要靠全體人民來維護的，每當提及敏感的政治或社會議題，某些人士面對持相反意見者便劍拔弩張，指責對方的不是，甚至口出惡言，以為說話越大聲，口氣越差勁便越占上風。而所謂的「溝通」，就是不斷向他人灌輸自己的觀念，最高準則是把對方洗腦，轉而投靠自己的陣營。反觀瑞士的理性公民，即使擁有不同文化及語言，但在彼此相互尊重的多元社會環境下，民眾有權利表達個人意見，但也尊重不同的意見，進而達成理性溝通的良好管道。

在臺灣，雖然母語相異的各大族群擁有共同的溝通語言，但彼此溝通似乎失靈。在面對多元文化及民族時，由於相異的成長背景與生活經驗，我們看待事物的觀點因人而異。這並沒有絕對的對與錯，最重要的是，承認每個人的不同，聆聽不同的聲音，並且試著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如此一來，整合各方的觀點可以幫助自己看得更加全面。一個社會擁有多種聲音並不會造成撕裂，只有情緒化的言語攻擊和不理性的對立才是社會分裂的主因。

關鍵在於同時也得尊重他人的意見。如果適逢選舉或公投，少數便得服從多數，多數也不得忽視少數的意見，雙方和平達成共識，才是多元、民主的真諦。

參、小國面臨困境利用巧實力突破困境

面對殘酷的現實，中共的崛起以及國際現實，我國已經無法再用大國思維來面對這樣現世的局面，政府要有基本的理性能力，以更開放的態度，來面對大陸對臺灣人開放的策略，用更彈性的作法，借力使力，充分發揮以小博大的靈活性。或許我國無法向瑞士一樣成為永久中立國，但卻能效法瑞士的成功經驗與精神，來突破外交困境。

小國有小國的優勢，我們可以選擇的機會有限，若我國能在策略選擇上採用巧實力策略，我國與中共最大差別是我國保有歷史悠久的傳統中華文化，能做為軟實力的最佳基礎，加上我國國防力量的自主性提高，相信一定能有所突破，而不是困在國內的政黨惡鬥，當前我國政黨必須理解「國家命運高於政黨利益」，必須建立合作一致對外的共識，只要人民亦認同政府的共識，如此一來，國家就有一致的共識來面對外來的問題及挑戰。內部達成共識，對外就能口徑一致，達成「臺灣共識」，那麼再困難的策略選擇都有達成的可能。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參考文獻

壹、中文參考書目：

一、專書：

中華民國106年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2017年。《中華民國106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市：國防部。

井尻秀憲著，邱榮全等合譯，1995年。《臺灣經驗與後冷戰的亞洲》。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王文科編譯，James H. McMillan, Sally Schumacher著， 2000年，《質的教育研究法》。臺北市：師大書苑。

王世榕，2009年。《直言－駐瑞士六年實錄》。臺北市：玉山出版社。

王建東，2016年。《孫子兵法大全》。臺北市：華威文化。

王高成，2017年。《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形勢與挑戰》。臺北市：時英出版社。

王皓怡，2017年。《2018年全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指數排名分析》。臺北市：國研院科研中心。

王曉波，2014年。《中國崛起與馬英九的困局》。臺北市：海峽學術。

包宗和、吳玉山著，2012年。《重新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社。

包宗和等合著，1999年。《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社。

布雷丁，2014年。《創新的國度：瑞士製造背後的成功基因》。臺北市：中信出版社。

何增科、陳雪蓮主編，2015年。《政府治理》。北京：中央編輯出版社。

吳家恆、方祖芳譯，Joseph S. Nye著， 2006年。《柔性權力》。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緯疆譯，Philip Shishkin著， 2015年。《不安的山谷 中亞，小國政治的悲劇》。新北市：八旗文化。

李靜宜譯，Joseph S. Nye著， 2011年。《權力大未來-軍事力、經濟力、網路力、巧實力的全球主導》。臺北市：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周春塘，2011年。《撰寫論文的第一本書－一步步教你如何寫，讓論文輕鬆過關》。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孟樊，2012年。《論文寫作方法與格式》。新北市：威士曼文化事業。

林季嫻，2007年。《臺灣人地關係初探》。臺北市：前衛出版社。

林淑馨，2013年。《寫論文，其實不難：學術新鮮人必讀本》。高雄市：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林添貴譯，Joseph S. Nye著， 2015年。《美國世紀的終結？》。臺北市：麥田出版。

林添貴譯，Zbigniew Brzezinski著， 2014年。《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林靜宜，2008年。《捷安特傳奇－GIANT全球品牌經營學》。臺北市：天下文化。

林麗容，2014年。《新台灣史》。新北市：上大聯合。

花亦芬，2017年。《像海洋一樣思考》。臺北市：先覺出版社。

邵永靈，2016年。《戰爭與大國崛起：烽火下的霸權興衰史》。臺北市：大旗出版社。

施昀佑譯，Diccon Bewes著，2015年。《瑞士做到的事》。臺北市：大家出版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社。

唐明輝，2009年。《美國在台海的角色探究》。新北市：問津堂書局。

孫武原著，陳書凱編譯，2017年。《這樣讀孫子兵法最輕鬆》。新北市：新文創文化。

師昀佑、黃郁倫譯，Diccon Bewes著， 2015年。《瑞士做到的事》。新北市：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徐昕等譯，Hans J. Morgenthau， 1990年。《國家間政治－尋求權力與和平的鬥爭》。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高德源譯，Jack Donnelly著， 2002年。《現實主義與國際關係》。臺北市：弘智文化。

張芳全，2017年。《論文就是要這樣寫》。新北市：心理出版社。

張春柏、陸乃聖譯，Paul Kennedy著， 2008年。《霸權興衰史：1500至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張維邦，2006年。《瑞士史－民主與族群政治的典範》。臺北市：三民出版社。

張慶勳，2016年。《論文寫作軟實力：悠遊在研究寫作天地中》。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戚嘉林，2000年。《臺灣新歷史》。臺北市：農學有限公司。

陳秀麗，2013年。《永久和平中立-台灣走向東方瑞士之路》。臺北市：望春風文化。

陳治世，1990年。《國際法》。臺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

陳雅惠，2016年。《瑞士不簡單》。新北市：遠足文化。

陳雅惠，2017年。《瑞士不一樣：顛覆你對最強小國的想像》。新北市：遠足文化。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陳熙樞著，1996年。《東方瑞士・台灣》。臺北市：大村文化出版。

陶威廉等著，1996年。《後冷戰時期亞太集體安全》。臺北市：葉強出版社。

彭孟堯譯，Randy L. Joyner、William A. Rouse、Allen A. Glatthorn著， 2013年。《如何寫出卓越的學位論文》。臺北市：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童振源，2014年。《台灣未來關鍵下一步：透視2016選前兩岸關係發展與政策》。新北市：博誌文化。

黃昭元等譯，Bruno Kaufmann, Rolf Büchi, Nadja Braun著， 2007年。《直指民主指南：瑞士與全球》。臺北市：台灣民主基金會。

黃昭元等譯、Bruno Kaufmann、Rolf Buchi、Nadja Braun著，2007年。《直接民主指南：瑞士與全球－2007年版》。臺北市：台灣民主基金會。

黃欽勇，2017年。《巧借東風：中美科技角力與台灣》。臺北市：大椽出版社。

黃筱薌等編，2016年。《勝於無形－國軍軟實力指標初探》。臺北市：國防大學政戰學院。

葉至誠，2005年。《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新北市：商鼎文化出版社。

葉家興譯，William Poundstone著， 2012年。《囚犯的兩難：賽局理論與數學天才馮紐曼的故事》。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

劉衛東，2017年。《一帶一路戰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鄭志凱著，2016年。《小國大想像：創新創業，開發以小博大的巧實力》。臺北市，遠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鄭武國譯，Giddens著， 1999年。《第三條路：社會民主的更新》。臺北市：聯經出版。

駱芬美，2015年。《被扭曲的臺灣史－1684～1972撥開三百年的歷史迷霧》。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戴寶村，2011年。《臺灣的海洋歷史文化》。臺北市：玉山社。

磯山友幸，2006年。《瑞士品牌攻勢》。臺北市：小知堂。

謝國斌，2013年。《族群關係與多元文化政治》。臺北市：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顏建發，2014年。《台灣的選擇：亞太秩序與兩岸政經的新平衡》。臺北市：新銳文創。

魏萼，1991年。《後冷戰時期之國際新秩序－中華民國之角色》。臺北市：亞洲與世界社。

魏錫鈴，2009年。《騎上峰頂：捷安特與劉金標傳奇》。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

嚴長壽，2017年。《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臺北市：天下文化。

蘇起、童振源主編，2013年。《兩岸關係的機遇與挑戰》。臺北市：五南出版社。

二、期刊：

丁志華，2018年。〈矽晶・電子：矽說台灣－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與全球地位〉，《科學發展》，第541期，頁21-29。

王大宇、蘇柏誠，2017年。〈國機國造引進智能製造策略研析〉，《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61期，頁74-88。

王思為，2013年。〈瑞士成為永久中立國之國際背景〉，《臺灣國際法季刊》，第10期，頁53-67。

巨克毅，2015年。〈當前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之探討〉，《宗教哲學》，第73期，頁67-75。

何農，2017年。〈瑞士的金融文化〉，《決策探索》，第19期，頁79-80。

初國華、張昌吉，2010年。〈戰略三角理論與台灣的三角政治〉，《問題與研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究》，第49期，頁92-104。

吳全全，2011年。〈德國、瑞士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特色與啟示〉，《國外職業教育》，第4期，頁15-16。

林克，2002年。〈迎戰「烽火外交」，北京外弛內張－中共圍堵台灣手段將更加強硬〉，《商業週刊》，第771期，頁64。

林郡妙，2006年。〈瑞士：永不墜落的鐘錶王國〉，《財經文摘》，第5期，頁80-81。

林國棟，2003年。〈「一邊一國」論述模式的起源與轉折〉，《黃埔學報》，第44期，頁77-97。

林麗香，2017年。〈軍事軟實力的發展與作為〉，《國防雜誌》，第30期，頁25-36。

姜大源，2011年。〈高等職業教育：來自瑞士的創新與啟示〉，《中國職業技術教育》，第4期，頁27-42。

紀舜傑，2005年。〈美國政黨競爭與外交決策之互動研究〉，《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期，頁103-118。

胡信正，2011年。〈美國、歐盟、中共、南韓及我國之國防產業發展研究〉，《聯合後勤季刊》，第27期，頁77-95。

倪炎元，2017年。〈2014年臺灣太陽花學運中的官方論述策略〉，《傳播與社會學刊》，第42期，頁23-57。

徐遵慈、李明勳，2018年。〈我國新南向政策的執行成果與未來展望〉，《經濟前瞻》，第176期，頁9-18。

馬丁，1994年。〈試論瑞士經濟發展模式〉，《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頁92-98。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許秀江，2017年。〈瑞士為什麼具有金融優勢？〉，《金融博覽》，第11期，頁22。

許忠信，2014年。〈台灣關係法與台灣經濟安全〉，《台灣國際法季刊》，第11期，頁15-32。

陳一新，2018年。〈美國會頻通過友台法案與川普的盤算〉，《中國評論》，第243期，頁22-25。

陳仁帥，2002年。〈我國武器獲策略之研究兼論國防法22條〉，《空軍學術月刊》，第545期，頁18-36。

陳明通、楊喜慧，2015年。〈兩岸政治談判協商主體與身份研究〉，《中國大陸研究》，第58期，頁80-95。

陳芳明，2016年。〈臺灣完成第三次政黨輪替〉，《二十一世紀》，第154期，頁4-12。

陳柏如，2010年。〈羅祥安談捷安特的品牌經驗〉，《自行車市場快訊》，第130期，頁34-37。

陳衍翰，2009年。〈向台灣自行車教父學經營心法要當CEO，先放大格局〉，《30周刊》，第53期，頁40-42。

曾怡仁、許書豪，2011年。〈試論金德伯格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思想〉，《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2期，頁137-140。

趙芷菱，2014年。〈打造台灣奇蹟 現代化之父李國鼎〉，《新紀元週刊》，第392期，頁10。

劉曉鵬，2017年。〈省思聖多美普林西比斷交與奈及利亞遷館〉，《戰略安全研析》，第141期，頁 27-34。

龐解，2012年。〈「台灣共識」與2012年總統大選〉，《中山學報》，第32期，

頁1-10。

譚偉恩著，2006年。〈權力平衡理論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國際關係學報》，第22期，頁129-165。

譚復興，2017年。〈瑞士蘇黎世的軌道交通〉，《城市軌道交通研究》，第9期，頁12。

三、學術論文：

唐欣偉，2000年。《強鄰威脅下小國英隊策略模式之個案研究》。台北：台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烏凌翔，2016年。《弱國面對強權之生存策略》。台北：台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郭正原，2014年。《臺灣活路外交與軟實力關係之研究（2008-2012）：心理戰略觀點的分析》。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瓊文，2011年。《瑞士族群融合與國家認同感－以中立政策為例》。台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傅澤民，2009年。《權力不對等之互動結構與小國面對強鄰的策略選擇：古巴、斯里蘭卡和台灣》。台北：台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傅澤民、蘇軍瑋，2011年。《抗衡？扈從？小國的第三條路：以台灣的大陸政策為例》。台北：2011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蔡侑諳，2013年。《從巧實力觀點探討我國國家安全-以「三道防線」為例》。桃園：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與國際事務碩士論文。

鄭中堂，2011年。《歐巴馬政府巧實力運用模式之探討-以美國對中國外交戰略為例。》台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賴沂廷，2016年。《小國面對強鄰主權需索下之擺盪現象：台海及烏俄主權衝突

之案例分析》台北：台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四、網路資料：

中華民國外交部公眾外交協調會，2012年08月16日。〈「中日和約」答客問〉，《中華民國外交部》。參見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53CFB45A329E6B01&sms=8BFD8EF69DF69F75&s=6AF7BADE42537535（瀏覽日期：民國107年03月27日）。

中華民國外交部條約法律司，2017年06月20日。〈臺灣的國際法地位〉，《中華民國外交部》。參見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E5B60D75EBD02E77&sms=779A2E76271875CF&s=A421F866010C8490（瀏覽日期：民國107年03月26日）。

江靜玲等著，2018年3月2日。〈美參院通過「台旅法」交川普簽署〉，《中國時報》。參見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302000506-260119（瀏覽日期：民國107年03月29日）。

季薇，2017年03月08日。〈2017全球最佳國家〉，《大紀元》。參見http://www.epochtimes.com/b5/17/3/7/n8884943.htm（瀏覽日期：民國107年04月03日）。

林志昇、何瑞元，2008年4月1日。〈台灣主權與國際地位〉，《台灣海外網》。參見http://www.taiwanus.net/roger/roger_35.htm（瀏覽日期：民國107年03月26日）。

高宜凡，2013年02月27日。〈瑞士是故意的〉，《遠見雜誌》。參見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17744（瀏覽日期：民國107年04月09日）。

陳昀秀，2008年8月8日。〈海洋史的大家長-曹永和院士（下）〉，《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參見http://homepage.ntu.edu.tw/~history/public_html/tsao/tsao_talk.html（瀏覽日期：民國107年03月27日）。

陳虎，2017年01月18日。〈永久中立國？瑞士憑什麼？〉，《壹讀》。參見https://read01.com/zh-tw/5ROgy2.html#.WqZWlxNubOQ（瀏覽日期：民國107年03月12日）。

陳雅惠，2017年07月13日。〈瑞士分裂中？－不一樣，就是不團結？〉，《換日線》。參見https://crossing.cw.com.tw/blogTopic.action?id=617&nid=8288（瀏覽日期：民國107年03月08日）。

楊之瑜，2018年05月01日。〈台灣18年來遭13國斷交，還有哪些邦交國「岌岌可危」？〉，《關鍵評論》。參見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4716（瀏覽日期：民國107年05月01日）。

楊毅、陳芃，2014年9月4日。〈郝伯村：台灣前途由全體中國人決定〉，《中國時報》。參見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904000373-260102（瀏覽日期：民國107年03月27日）。

蕭富元，2016年06月21日。〈瑞士把矛盾，融成天堂〉，《天下雜誌》。參見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7018（瀏覽日期：民國107年04月09日）。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貳、英文參考資料：

一、專書：

Andrea Ó Súilleabháin, 2014. *Small States at the United Nations: Diverse Perspectives, Shared Opportunitie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eace Institute.

Annette Baker Fox, 1959. *The Power of Small States: Diplomacy in the World War 2*.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rnest J. Wilson III, 2008.*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Hard Power, Soft Power, Smart Power.*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Hans J. Morgenthau, 1967.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Jose E. Borao et al. eds., 2001.*Spaniards in Taiwan (Documents) Vol. I: 1582-1641*.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Joseph S. Nye, 2004.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Joseph S. Nye, Jr. , 2002.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oseph S. Nye, Jr. and John D. Donahue, 2000.*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 New York: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Kenneth Waltz,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二、期刊：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Dwight Venner, 2009. "Small States Face Big Challenge," *Development Outreach*. 11(3):25-28.

Haken Wiberg, 1987. "The Security of Small Nations: Challenges and Defence ",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4(4):339.

Joseph S. Nye, Jr. , 1990 .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5(2): p.188.

LI Guangyun , FAN Baixing , 2017. “The Development of Precise Engineering Surveying Technology,”・*Acta Geodaetica et Cartographica Sinica* . 46(10):p. 1-5.

Paul Cammack, 2008. “Smart Power and US Leadership: A Critique of Joseph Nye,” *49th Parallel*. 22 (1):4-20.

Suzanne Nossel, 2004. “Smart Power, ” *Foreign Affairs*. 83(2):131-142.

Wojciech Czakon, 2009. “Power asymmetries, flexibility and the propensity to coopet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SMEs’ relationships with franchisors,” *Int. J. Entrepreneurship and Small Business.* 8(1):44-60.

參、網路資料：

Swissando, 2016.“ House Of Switzerland Brazil 2016”, *PRESENCE SWITZERLAND*, At http://swissando.com.br/en (Accessed 2018/4/3).

The Creative Future Company, 2015. “Country Brand Index 2014-15”, *FutureBrand*, At http://www.futurebrand.com/uploads/CBI2014-5.pdf (Accessed 2018/4/3).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0. “Agency Financial Report – Smart Power In Action. ” At 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50505.pdf (Accessed 2017/10/7).

USC 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2017.“ The Soft Power Overall Ranking 2017”, *THE SOFT POWER 30*,. At https://softpower30.com/ (Accessed 2018/4/3).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